

# 滿族簡介

編輯部

滿族是中國最偉大民族之一，建立的清朝是中國胡族所建政權享祚最長的王朝，提起滿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堯舜時代的肅慎，可見滿族也是一支源遠流長的民族，肅慎族的生存空間在今天的黑龍江到長白山一帶，所以談到滿清龍興之地，總是以黑水白山來形容。今天的滿族已經融合了許多肅慎支系的民族，而以女真族爲主要的骨幹，提起女真族，她在中國歷史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曾經建立了兩個正統王朝，早期的金及後來的清，而金史是我國正史之一，將來清史編成後，當然也是正史，從這個角度看，是所有胡族唯一建有兩個正統王朝，擁有兩部正史的民族。

滿族的語言是屬於烏拉阿爾泰語系、阿爾泰語族滿洲一通古斯語支的滿語，早期女真金曾經創制了女真大小字，在外觀上看起來像漢文，但是卻是拼音的，可惜金朝滅亡後，女真字已經沒有人能解讀了，成了死的文字，十六世紀末，女真族借用蒙文字母拼寫滿語（蒙文字母又是借用古回紇字母），稱之爲滿文，記載了許多清初的史事，直到現在，要研究清史還得看得懂「滿文老檔」，可見滿族是一支充滿文化氣息的民族。

早期滿族就像一般北亞民族一樣信奉泛靈信仰的薩滿，清朝入關後，逐漸接受了佛教、道教，但是原有的薩滿信仰並沒有完全放棄，在民間遇到重要節日，往往都要請薩滿巫來跳神。清朝是全國性的王朝，而滿族又是編入八旗駐防全國各地，因此很快的接受了漢人的語文跟習俗，到了現代，所有滿族幾乎全部使用漢語文，在習俗上也跟漢人沒有兩樣了，不過漢人男女的正式禮服長袍馬褂、旗袍卻是源自滿族，可見不同的民族總是彼此互相吸納對方的文化，共同融合成爲一個既新又強大的民族。滿族特別講究孝道，這點跟漢人非常相似。

清初康雍乾三帝，是清朝的盛世，無論文治武功，都不遜於漢唐，在武功上開疆闢土，奠定了今日中國的版圖；在文治上，一部康熙字典，集漢字之大成，而四庫全書更是中國學術文化的總匯，同時也是舉世最大的一部套書。而將台灣正式納入中國版圖的，也是清朝，凡此都是滿族對中國的貢獻。目前滿族最大的聚居地區雖然還是在東北，但遠在新疆甚至台灣也都有滿族，滿族真是一支了不起的民族。

## 目 錄

昭武九姓與唐朝之關係 .....	劉學鈞	1
烏蘭夫與四三會議研究 .....	孟繁荔	41
大陸內地開辦的西藏中學和西藏班概述 .....	周潤年	55
評介崔著《中國古代和親史》 .....	劉學鈞	71
踏上大興安嶺走進嘎仙洞—鮮卑石室參訪記 .....	劉學鈞	75
中國邊政協會第 38 屆 94 年第 2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紀錄 .....	編輯部	83
稿 約 .....		85

# 昭武九姓與唐朝之關係

劉學鈺  
中原大學教授

## 摘要

昭武九姓原是月氏胡之裔，始聚居於敦煌、祈連間、匈奴頭曼單于時，其聲勢頗大，似駕凌匈奴之上，頭曼且以子冒頓質於月氏，頭曼欲立所愛閼氏子為嗣，乃舉兵伐月氏，冒頓趁亂奪月氏健馬逃回匈奴，匈奴人皆勇之，頭曼乃予以部眾，冒頓自是有部眾，施以訓練，並以鳴鵠箭射頭曼而自立，遂自立為匈奴單于，初示弱東胡，故予寶馬，美人，終滅東胡<sup>1</sup>聲勢由是大振，遂擊月氏，月氏不敵西徙，其後復為烏孫所擊（在匈奴支持下）再西徙，至今中亞錫爾、阿母兩河流域，稱大月氏，另未西遷者，保南山一帶稱小月氏，其西徙部分，以其來自敦煌，祈連間之昭武，到今中亞後，遂以昭武為氏，以族系繁多枝葉茂盛，分為九國，遂稱之為昭武九姓，在突厥興起威服中亞之前，昭武九姓稱雄中亞，其後大唐威服中亞，昭武九姓皆臣服於中國，本文擬就昭武九姓與唐朝之關係作一敘述。

**關鍵詞：**月氏、昭武九姓、薩馬爾罕

---

<sup>1</sup> 關於冒頓之得位及滅東胡，《史記·匈奴傳》有詳細之記載，拙撰《匈奴史論》（臺北南天書局，1983年出版）也曾提及，但與本文主題關係不大，從略。另日人白鳥庫吉認為冒頓與後代蒙語之英雄（讀若巴阿禿兒，與冒頓音相對應。詳見白鳥氏之《東胡民族考》方壯猷譯，上海商務，1933年），果而，則冒頓當係自月氏逃回後，匈奴國人勇之，乃以冒頓（英雄）稱之，如是則渠在逃回之前，必另有名字。

## 壹、月氏族源略述

月氏讀若肉支，關於此民族之源流，歷來有不同之說法，有主張月氏即古文獻上所稱之禺氏者；有認為月氏係西方所謂之斯基泰人者，也有認為月氏與巴澤雷克（pajirik）古墓之人種相同<sup>2</sup>，甚或直指月氏係塞種人，諸種說法紛陳，百餘年來迄無定論，本文也無能力解決此項爭論，僅將諸種論說酌加介紹，供各界參考。

指月氏即古文獻上之禺氏；按禺氏一詞首見於《穆天子傳》<sup>3</sup>作「乙亥至於焉居、禺知之平。」禺知之平者，指禺知平原，以禺知、月氏讀音相同，日人小川琢治即主此說<sup>4</sup>；另大陸學者余太山於其所編《西域通史》中直指：

「《穆天子傳》在敘述河奮附近一段旅途時，提到了“禺知之平”（禺知人所居之平原）。『禺知』，在先秦典籍中，也寫作『禺氏』或『月氏』，月氏是一個遊牧部族，在天山東端。」<sup>5</sup>

此說並未舉出禺知何以即月氏之理由，僅以禺知也寫禺氏或月氏，即逕予認定禺知即月氏，說服力似顯不足，斷禺知為月氏雖缺乏證據，但持否定論者，也缺乏有力之論證加以反駁，以是在探討月氏族源時，月氏即禺知始終佔有一席之地。

不過晚近史學家王桐齡氏（曾著有《中國民族史》）於其所著《東洋

<sup>2</sup> 所謂巴澤雷克墓，係指魯金科（Rudenko）在阿爾泰山發掘之古墓，據魯金科於 1953 年之文章認為該墓主係西元前五至三世紀人，恰與月氏之時代相合，遂加以認定。參見下榎一雄 G.A.科舍倫科（koshelenko）Z 海達裏（haidary）所撰〈月氏人及其遷移〉該文輯入《中亞文明史》第二卷第七章，該書共六卷係由雅諾什，哈爾馬塔（Harmatta）主編，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於 1980 年決定籌編出版，中文版係由徐文堪芮傳明翻譯，余太山審訂，由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2 年出版，頁 130。

<sup>3</sup> 《穆天子傳》一書於晉武帝司馬炎太康二年（西元 281 年）發掘戰國時汲縣魏釐安王塚而得此書，同時而得者尚有《竹書紀年》、《汲冢周書》，晉時郭璞專於此書，惜之後千餘年均無人繼之，清季始有檀萃、徐文靖、陳逢衡、洪頤暉等專研此書，惟未見流傳，迨民初有丁謙、顧實也治此書，另張星娘於其《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前篇第十章曾將此書前四卷列入並詳加校註，彌足珍貴。此處係採用上海古籍出版社《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版 1999 年版，卷一。

<sup>4</sup> 此處係轉引岑仲勉之《漢書西域地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1981 年，頁 216。

<sup>5</sup> 余太山主編《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96 年，頁 46。

史》中，以《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將《穆天子傳》列小說家類中，以是王氏亦謂《穆天子傳》為小說體裁，故所載之事，未敢盡信云云，關於此點，同時代之史地學家張星烺頗不以為然，張氏稱：

「王桐齡君為史學專家，乃亦為此批評（指穆傳為小說體裁，未敢盡信云），吾誠不解其故。小說中，有第二部書其體裁與《穆天子傳》相似者歟？書之稱為小說，必其言怪誕難信，無可考證。至若《穆天子傳》，乃一純然旅行日記。依其干支，考證地理，皆歷歷不誤。而王君竟謂所載之事，未敢盡信。吾不知書中究有何處使王君不敢信之也。」<sup>6</sup>

就上引張星烺氏之看法，直認《穆天子傳》乃事實之旅行日記，為史料而非小說，何況穆傳中之禺知，未必不能視為秦漢時之月氏。此外，復有人以《左傳·襄公十四年》（西元前 559 年）中之「駒支」，以其讀音與月氏相近，且駒支之祖先吾離曾被逐至瓜州，而瓜州正是後代月氏聚居之處，則斷月氏為駒支之後，也有可參考之處。惟《左傳》稱駒支為戎子，戎者習稱西戎，居華夏之西，似為西羌之屬，如是，則斷月氏為駒支之後，大有商榷餘地。

認月氏為阿色尼（asiqi）、帕色尼（pasianqi）、吐火羅（tocharoi）及塞伽羅（sakaraulqi）四部族之混合體<sup>7</sup>，另貝烈（H.W. bailey）氏則謂大月氏之氏，讀如氏族之氏，“大月”乃吐火羅之譯名（即音譯），大月支之支猶言支派。<sup>8</sup>亦即月氏為吐火羅；但此種說法有其不正確之處，按上述阿色尼等四族係聚居於錫爾河（Sir darya），其中心部分為吐火羅（Tochara），也即司馬遷《史記》稱：大夏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善賈市<sup>9</sup>；《史記》又稱：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可見大夏為今中亞地區之大國，大夏雖有學者考證認係希臘統治下之巴克特里亞

<sup>6</sup>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 2003 年出版，第一冊，頁 89。按此書早於 1930 年即已出版，共六冊，列《輔仁大學叢書》，其後曾多次再版，2003 年 6 月北京中華書局再次將之出版，改裝訂為四冊。

<sup>7</sup> 同註 2 所引《中亞文明史》第二卷，頁 127。

<sup>8</sup> 《東方雜誌》〈吐火羅語考〉，但此處係轉引自註 4 所引書頁 216~217。

<sup>9</sup> 《史記》·〈大宛列傳〉。

(bactria)<sup>10</sup>，但與史實不盡符合，蓋希臘治下之巴克特里亞，其士兵習戰鬥<sup>11</sup>；是則大夏亦即吐火羅與《史記》所載有相當之出入，縱然退一步說，吐火羅確為月氏，則月氏西遷後滅大夏，是則無異等同吐火羅（月氏係吐火羅）滅吐火羅（大夏係吐火羅），此種說法在語言邏輯上無法成立。但仍有「許多東方學者已有很長時期曾經建議把月氏與吐火羅統一化<sup>12</sup>，此等「許多東方學者」仍然陷入前述語言邏輯之難題中。當語言邏輯無法貫通時，所有論述均將難以成立。

論者認為月氏即西方史上之斯基泰人 (scythians)，《西域文明史》一書即稱：

「看來最可信的論點是將月氏與斯基泰人勘同——這種看法適合西元前三至二世紀的中亞情勢，較之任何其他理論更為可信。」<sup>13</sup>

持此看法者認為漢語「月氏」之古讀音為「zngi-wat-t'ia」，其外族語原形可能是 zguxa，正好被認為是斯基泰一語的轉寫<sup>14</sup>；恕筆者學淺，實在無法意會屬孤立語型 (Isolating languagetype) 漢語之「月氏」一詞，何以古音要讀為「zngi-wat-t'ia」，在此一語言問題無法解決前，指月氏即斯基泰，幾無說服力。回憶此間數十年前曾有人認為漢語與蒙古語同源，惟漢語後孤立化，渠並舉例證明。如：蒙語「頭臚蓋」（頭），孤立化後成為漢語之「頭、臚、蓋」三字，該人廣為蒐集數百例合為專書<sup>15</sup>，惜數十年來，竟無一人加以附合，其說自無法成立。以月氏比為斯基泰大約類似。更何況，所謂斯基泰者，其本身即頗被雜，在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題名錄上將斯基泰人分為以下三類：

1. 薩卡—荷馬瓦爾加，亦即吾人所習稱之薩斯人，而薩斯人亦即使用頗廣之塞種人。此種人聚居於費爾幹那及喀什。

<sup>10</sup> 余太山撰《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9。

<sup>11</sup> 《中亞文明史》卷二，頁128。

<sup>12</sup> 法人勒尼·格魯塞 (rene ggousset) 著《草原帝國》魏英邦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47。

<sup>13</sup> 《中亞文明史》卷二，頁128。

<sup>14</sup> 同註12。

<sup>15</sup> 書稱《蒙漢語文比較學舉隅》中國邊疆語文研究會印行，1969年。

2.薩卡—梯格拉柯達，居於鹽海沿岸及錫爾河下游。

3.薩卡—達拉德喇雅，即指海外之薩卡，聚居於俄羅斯南部，通常泛指在中亞之斯基泰人<sup>16</sup>。

如是，則指月氏爲斯基泰人，如同指月氏爲塞種人，然而斯基泰能否等同塞種，本身又是一樁歷史公案。

抑有進者，西人希羅多德（Herodotus）認爲西元前七世紀，曾有一波民族大遷徙，結果南俄爲斯基泰人所占據，其所以西遷者，係受在其東方之伊塞頓人（Issedones）之推動下西進，未隨之西徙之斯基泰人仍停留在黃河上游甘肅西部，中國稱之爲月氏<sup>17</sup>，此種說法仍屬推測性質，無法評估。

此外，關於月氏究竟爲歷史之何種民族，約略整理各種文獻，尚有以下多項，爲節篇幅，儘量不多作分析：

1.早在十八世紀時，法人約瑟夫·居尼斯（Joseph Deguines, 1721-1800），認爲月氏係韃靼族，此實爲無意義之說法，蓋古往今來從未對所謂韃靼族作出清晰明確之界說，如巴克爾（E. Parker）之《韃靼千年史》一書，將自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契丹……乃至蒙古，泛稱之爲韃靼，因此指月氏爲韃靼族，猶如指月氏爲胡族，毫無意義。

2.十八世紀末德人克拉普洛忒（J. Klaproth, 1783-1835 年）初期認爲月氏爲西藏族，李特爾（德人，C. Ritter, 1779-1859 年），李希吐芬（德人，F. Richthofen）及聖馬丁等皆附和之，其實此種說法極不可取，吾人皆知月氏早在西元前，已見諸漢文文獻，而西藏一詞，晚至清乾隆時（西元 1736-1795 年）時始成爲定稱，之前則稱之爲吐蕃，但也不能早於唐（西元 618-907 年），西元前何曾有西藏之名？即使後世之藏族擁有月氏之血胤，吾人也僅能說藏族爲月氏之族裔，絕不能稱月氏爲藏族，西人治中國邊疆民族史，往往顛倒時序祖孫不分，不知渠等因無知或刻意如此。指月氏與藏族同其血胤，不知所據者何？因此極不可取。

3.拉森（挪威人，Chr. Lassen, 1800-1876 年）認爲月氏係突厥人，其

<sup>16</sup> 《草原帝國》，頁 24。

<sup>17</sup> 《中亞文明史》，頁 131。

後夏德（f. hirth）、汪貝利（vambery）及日人藤田豐八，白鳥庫吉均附和之，白鳥庫吉稱大月氏在印度所鑄之硬幣，其人像面貌固不一致，但概括言之，鼻樑鉤曲之處，類似閃族（shem），既類似閃族，自不得與非閃族之突厥同祖，白鳥既附和於前，又自我否定於後，自相矛盾，再者此說同樣顛倒時序，以先有之月氏歸於後起之突厥，謬矣。

4.英人威爾斯（H. wells）認為大月氏與匈奴同種，此說也不正確，按秦漢時，獨匈奴稱胡<sup>18</sup>，位於其東之鮮卑、烏桓部落則稱東胡，位於其西之西域各族則稱之為西胡，其非匈奴，乃顯而易見者，抑有甚者，當匈奴威服西域各國後，致書漢廷稱「諸引弓之國皆號匈奴」，可見西域諸國並非匈奴，再者，未隨大月氏西徙者，也未稱匈奴，故此說也不可信<sup>19</sup>。

以上諸說各有不周延處，因此均無法成為定論，事實上在文獻不足而考古發掘也無實證情況下，僅憑一鱗半爪強定某族為某族之後，或某族與某族共祖，均屬不必要之舉動，匈奴自匈奴、月氏自月氏，突厥自突厥…縱在文化習俗或語言有其若干相類甚至相同，也不宜據以指稱兩者為同族，蓋文化、語言、習俗…均可互相影響，互相借用，因此互有雷同，乃是極自然之事。

## 二、月氏之西遷

月氏雖有可能係上古時禹知或禹氏，但僅憑《穆天子傳》一書，尚難完全加以肯定，況且穆傳對月氏（禹知）之描述過於簡略，必待司馬遷之《史記》出，對月氏之事跡始稍有記載，吾人自是得知月氏始居敦煌、祁連間，如《史記》僅稱：「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祁連係山名，今仍有之，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對山似乎情有獨鍾，往往以相同之名，名不同之山，因此以祁連山為名之山，或者不限於今之祁連山，按「祈連」自匈奴以來諸多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若突厥、回紇、蒙古，在其語言中皆為「天」之意，換言之，上述諸游牧民族經常以己身心所嚮往之山，皆名之為天山或祈連山，此種情形在鮮卑民族中也有之，如大鮮卑山，常隨鮮卑民族遷徙而出現於不同地方，因此不必刻意對祁連山作過多之考證，所幸

<sup>18</sup> 胡，或為匈奴人自稱，詳見劉學鈞《匈奴史論》臺北南天，1983年。

<sup>19</sup> 以上四說引自注4所引書，頁215。



《史記》已明指月氏始居敦煌、祁連間，則此祁連山即今甘肅境內之祁連山。

秦漢之時，月氏與烏孫均聚居於敦煌、祁連一帶，時月氏聲勢壯大，匈奴頭曼單于以其子冒頓質於月氏，可見其時月氏強於匈奴，及冒頓逃回匈奴、奪得單于之位後，匈奴之勢漸盛，其時大約為西元前 206-202 年之間（漢高祖劉邦元年至五年），冒頓單于自立之後，整軍經武，實力大增，先是居匈奴東方之鮮卑、烏桓（或作烏丸）部落聯盟，以其居匈奴之東，漢文文獻遂稱之為東胡<sup>20</sup>，東胡初以冒頓單于弑父自立<sup>21</sup>，遂向匈奴索取寶馬、美人；冒頓皆予之，以驕其志，東胡以冒頓怯懦，乃更求甌脫<sup>22</sup>之地，冒頓單于遂一舉擊滅東胡，東胡崩解分裂為鮮卑、烏桓，臣服於匈奴，至東漢中晚期，始重登歷史舞臺。匈奴自擊滅東胡後，聲勢大振，可能在西漢呂后、文帝之交、匈奴冒頓單于使其右賢王西擊月氏，月氏不能敵乃西遁至伊犁河流域，冒頓單于於西元前 176 年（西漢文帝前元四年）致書漢廷曰：

「…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

以天之福，吏卒良馬疆力，以夷滅月氏（大勝則有之，夷滅實誇大之詞），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當係三十六國之誤），皆以為匈奴。」<sup>23</sup>

此次月氏自敦煌、祁連間西遷至伊犁河、楚河流域，為月氏之首次西遷。西遷之月氏以大月氏稱之，仍留故土退保南山者遂以小月氏之名傳世；先是月氏曾攻擊烏孫並殺烏孫王難兜靡<sup>24</sup>，其時難兜靡子昆莫初生，棄之於野，有烏嚙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

<sup>20</sup> 在諸胡列國之前「胡」乃專指匈奴，而居其東者稱東胡，居其西者稱西胡，居其北者稱北胡。

<sup>21</sup> 關於冒頓單于弑父自立一事，《史記·匈奴列傳》有詳細之描述，此處不贅。

<sup>22</sup> 甌脫係指匈奴、東胡間不能居人之沙磧地。

<sup>23</sup> 《漢書·匈奴傳》

<sup>24</sup> 月氏攻擊烏孫之正確年代，業已難於考訂，《史記·大宛傳》認係烏孫為匈奴所破，不確，日人桑原鷺藏於《張騫西征考》（台灣商務，1969 年，頁 20、71）中已有說明。而《漢書·張騫傳》也有相同說法，惟《漢書》誤月氏為大月氏。

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sup>25</sup>，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sup>26</sup>。此時月氏已西遷至伊犁河、楚河流域，烏孫<sup>27</sup>既有「控弦數萬」，力量已然甚為強大，且其後復有匈奴之支持，是時烏孫可能已越過今準噶爾盆地，而與月氏接壤，昆莫自然憶及其與月氏有殺父之仇，雙方衝突乃不可免。初月氏西遷伊犁河、楚河流域，該地區原為印歐系塞種人（sakas）聚居空間，但在力不如月氏之情況下，塞種人被迫外移，部分向南逃入印度西北部，建立罽賓國，更多則逃向西方及西南方<sup>28</sup>，大月氏既有其地，休養生息，可能又擁有相當人口與實力。但烏孫在匈奴支持下，力量既已到達此地，遂與大月氏發生衝突，由是烏孫在匈奴支持配合下，對月氏展開大規模之攻擊，此次戰爭大月氏大敗，大月氏王被殺，其頭匈奴竟取為飲器<sup>29</sup>，由是大月氏再度向西遷徙而入於今中亞地區，時為西元前 130 年<sup>30</sup>。

此事件後不久，匈奴軍臣單于死，而烏孫既戰勝大月氏而有其地，自是實力大增，不肯再行服事匈奴，匈奴雖也曾派兵攻烏孫，竟不能勝，以為烏孫昆莫有神助，遂不再擊烏孫。此種情形為所遣通西域之張騫知悉，認為可以聯合烏孫以斷匈奴右臂，而聯合之道則以翁主嫁烏孫王昆莫，漢武帝如其請，以江都王建之女細君為公主嫁烏孫昆莫，昆莫以之為右夫人，匈奴為攏絡烏孫，也遣女嫁昆莫，昆莫之以為左夫人<sup>31</sup>，細君公主以遠嫁異域，語言習俗均難適應，兼以昆莫又已年老，因此時感悲傷，乃自作歌曰：

<sup>25</sup> 王念孫認為西城係西域之誤，故余太山所撰《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中逕改為西域，但日人藤田豐八之《西域研究》（台灣商務，1971 年，頁 82）仍認為西城為是，且引同傳中敘述武帝元狩二年（西元前 121 年）霍去病伐祁連山時稱：「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也為西城；另《漢書·張騫傳》則稱「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也未用西域二字，是西城乃指匈奴西邊之地。

<sup>26</sup> 以上係引《史記·大宛列傳》

<sup>27</sup> 烏孫族名或許含有傳說中之「烏哺狼乳」，而含有「烏之子孫」之意，見注 10 所引書頁 27。

<sup>28</sup> 麥高文著（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章巽譯《中亞古國史》北京中華書局 2004 年，頁 130。

<sup>29</sup> 史、漢均載有此事。

<sup>30</sup>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頁 15-16。

<sup>31</sup> 《史記·大宛列傳》，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尚左，顯然烏孫重匈奴甚於漢廷。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遠托異國兮烏孫王；  
 穹廬為室兮旃為牆，  
 以肉為食兮酪為漿，  
 居常土兮心內傷，  
 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此歌傳至長安，漢武帝聞而憐之，但為聯烏孫防匈奴，僅命使厚贈物品。昆莫既已年老，而太子又早死，乃以其孫岑娶為太子並使之即王位，依草原游牧民族習俗，岑娶將娶細君公主，公主不從，上書漢廷言狀，武帝為貫徹共防匈奴決策，命細君公主「從俗」，遂嫁岑娶，生一女，細君公主死，漢廷復以楚王戊之孫女解憂為公主嫁岑娶，此雖為漢廷與烏孫間之一段插曲，但為瞭解大月氏西遷過程中不可或缺者。

大月氏既為匈奴、烏孫所擊敗，大部分西徙今中亞地區（仍有部份留伊犁河、楚河流域，成為烏孫之臣民），仍以人數眾多實力也尚強，沿途越過大宛而至大夏<sup>32</sup>，擊大夏而臣之，由是遂立足於大夏之地。大月氏既至大夏之地，以監氏城為都<sup>33</sup>，據史傳所載當時有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就當時情況而言，已是龐然大國。

按大夏原本系各城邦組成之「國家」，並無統一之君王，各城邑自有統治者，因此人單力薄、民弱畏戰，以是大月氏徙來後，各城邑均降大月氏，而大月氏也深知憑一己之力，不可能完全統治大夏，由是對大夏原有之五翕侯一仍舊貫，均由大夏人出任，此所謂五翕侯者為：休密翕侯，治和墨城；雙靡翕侯，治雙靡城；貴霜翕侯，治護澡城；肸頓翕侯，治薄茅城；高附翕侯，治高附城<sup>34</sup>。大月氏透過此五翕侯、控制整個大夏地區，

<sup>32</sup> 大宛，在西漢時為國名，產良馬，其地位今費爾幹那盆地，詳情可參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科出版社，1992年，頁70-75。大夏也國名其地位於今阿姆河流域，詳情可參見《塞種史研究》頁24-51。

<sup>33</sup> 《漢書》作監氏城，但《史記》作藍氏城。

<sup>34</sup> 此五翕侯及其所治之城，《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頁122-124有詳細之考證。

蓋大夏地區已進入農業化，因此遊牧民族（大月氏為遊牧民族）往往利用當地土著進行間接統治，此種方式屢見於匈奴、嚙噠、突厥乃至於後來之西遼等，史傳所謂皆屬大月氏，乃指此五翕侯按時進貢稅賦，方物用示臣服而言，並非直接統治。

大月氏西遷阿姆河流域時，雖有戶十萬口四十萬，但與整個廣義之西域相較<sup>35</sup>，仍屬少數，因此文化習俗上易與當地土著相混融，甚至因通婚等關係，在血緣上也與土著相融合，大月氏也復如此。其後匈奴分為南北、南匈奴附漢，北匈奴西遁入中亞，威服中亞諸國，其後嚙噠、突厥復入主中亞，大月氏經此數百年之分化，至隋、唐時，在中亞與大月氏有血緣關係者為昭武九姓，其所以稱昭武者，據《隋書、康國傳》稱：

「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

而《唐書、西域傳》則更進一步稱：

「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末建。……君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此處應為“為匈奴所破”），稍南依葱嶺，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

以上兩項史料中之昭武城，地當今甘肅省肅州附近，確在祁連山北，由是昭武九姓之名遂成為定稱。上引九姓中漏康姓，而戊地乃伐地之誤，即西安國；火尋即《史記·大宛列傳》中之驩潛，《大唐西域記》<sup>36</sup>作貨利習彌伽，《元史》西北地附錄作花刺子摸；此二國人在唐代未見以國為姓，此外，尚有穆國似亦應在九姓之列。另者九姓不必然代表有九國，如曹國有東、中、西三曹；安國有東、中、西三安；史國有大、小二史，昭武九姓諸國互不統屬，但以康國（即颯秣建或薩末鞬）馬首是瞻，如《大唐西域記》所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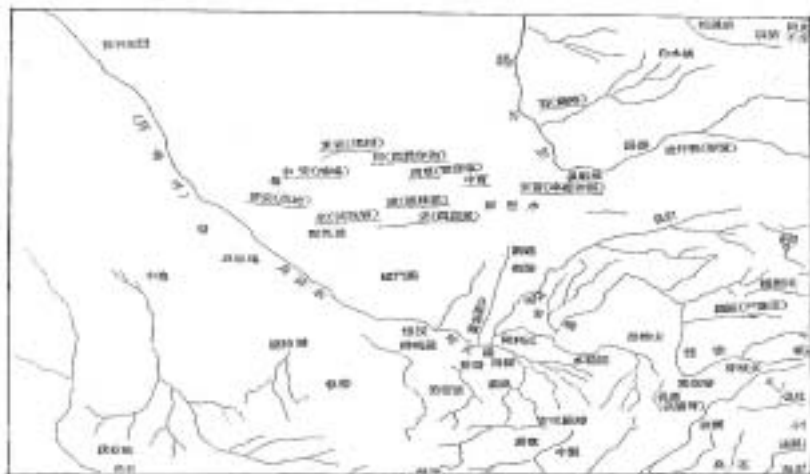
<sup>35</sup> 西域一詞有廣、狹二義，廣義之西域含今之中亞及中國境內天山南北，狹義之西域僅指後者，見《西域通史》頁1。

<sup>36</sup> 《大唐西域記》唐玄奘、辯機著，2004年北京中華書局由季羨林校注予以出版，關於貨利習彌伽，在上冊頁96，另同書頁94明指伐地即西安國。

「颯秣建國，…凡諸胡國，此爲其中，進止威儀，近遠取則。」<sup>37</sup>以是康國可稱之爲中亞昭武九姓之首。另者所謂昭武九姓，不必然代表九國，如曹、安各有三國，史有二，而此曹、安、史三姓尙難斷定其爲當地土著或大月氏後裔<sup>38</sup>，月氏或作月支，史上習將月氏之裔稱爲支姓，因此自後漢後至隋唐，凡以支爲姓者，幾可斷定係源自中亞月氏之族。此外，自秦漢以至諸胡列國（即習稱之五胡十六國），「胡」之一詞乃專指匈奴而言，但自鮮卑拓跋氏建立北魏統一北方後，匈奴一族沒落，「胡」之稱謂遂轉而指廣義西域（即今中亞地區）若月氏胡、康居胡、波斯胡以及較晚之九姓胡，其中尤以九姓胡最爲著稱，以其最具文化氣息及貿遷有無能力，但九姓胡中之曹、安、史是否源於月氏，難以斷定，因此雖以九姓爲統稱，但其內涵則頗爲複雜，遂有雜種胡之稱，近人陳寅恪於其校讀《唐書》及以詩證史有言：

「雜種胡即中亞昭武九姓胡。唐人當日習稱九姓胡爲雜種胡。雜種之目非僅混雜之通義，實專指某一類種族而言也。」<sup>39</sup>

可見雜種胡在唐代係一專有名詞，專指昭武九姓而言，滋爲更進一步瞭解昭武九姓大致分佈情形，以簡略地圖附列於下以供參考。



<sup>37</sup> 《大唐西域記》頁 87-88。

<sup>38</sup> 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匯輯》中華書局，1957 年，頁 179-180，但此處係轉引自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 年，頁 3。

<sup>39</sup>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1980 年，頁 2，但此處係轉引自《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一書。

### 三、昭武九姓概況

昭武九姓分佈情況略如上圖，括號內之國名可自《大唐西域記》中找出，除石國在錫爾河東岸外，餘皆在兩河之間，也即後世所謂之河中地帶，昭武九姓諸國在東漢曹魏時以粟特或粟弋之名著世，唐稱率利或速利，如《大唐西域記》即以率利地區稱之，從上圖中可見康國（即颶秣建，今薩馬爾汗附近）居於諸胡之中，昭武九姓諸國也即粟特地區，大小城邦密佈其間有如天上繁星，以是素有千城之國雅稱，從前賢研究成果得知昭武九姓聚居之河中地區，人口密集之處可分為：都、城、堡三級，如康國、都颶秣建（即今薩馬爾汗，北魏時稱悉萬斤，此三字如以閩南語讀之，與颶秣建幾無二致，於此也可知閩南語確實保存有甚多古漢語讀音），有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安國，都阿濫誼，大城四十，小堡千餘<sup>40</sup>，地方建置既為三級，其官制自也有三級稱謂，如國王、城主及大首領，或作王，主及統領。

河中地區原土著民族及大月氏後裔之昭武九姓，由於地理環境處於東西方之間，兼以以城堡為主，難以形成權力集中之大國，一旦強大勢力進入，即淪為被統治者，但也由於特殊之地理環境，外來之統治者，也難於全面掌控，往往授權當地領袖進行間接統治，統治者則收取貢物、稅金，時日一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文化習俗語言上彼此互為融合，形成粟特地區之新文化。之後，復有外來強大勢力進入，再進行間接統治，如是周而復始，如大月氏來則臣於大月氏，匈奴來則臣於匈奴，嚙噠來則臣嚙噠，突厥來則臣突厥，大唐來則臣大唐，大食來則臣大食…，大致而言，西元 618 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建牙於千泉（在碎葉城附近，今吉爾吉斯托克瑪克附近），昭武九姓皆淪為西突厥之屬國，及唐高宗顯慶四年（西元 659 年），唐滅西突厥，在其地置羈縻州府，九姓昭武遂臣於大唐，至西元 709 年（唐中宗李顯景龍三年），大食滅安國後，大食力量大舉進入河中地區，及至西元 750 年（唐玄宗天寶九年），唐將高仙芝謂與石國約和，及會面以兵擊之，虜石國王以歸，石國王子走告昭武諸胡，於是諸胡皆怒，遂潛引大食兵欲共攻四鎮，次年，高仙芝將

<sup>40</sup> 《新唐書》卷二二一下。

蕃漢兵三萬擊之，進入七百里與大食戰，結果高仙芝大敗，士卒死亡殆盡，從此九姓昭武遂臣大食。

粟特地區各民族（含九姓昭武）此項民族特性，實為研究中亞問題之基本概念，王國維於〈西胡考、西胡續考〉中說之甚詳（該二文輯入王氏《觀堂集林》一書頁 606-620，北京中華書局，1959 臺北河洛出版社，1975 年影印出版），王氏稱：

「西域人民，以國居東西之沖，數被侵略，亦遂專心職業，不復措意政治之事，是故希臘來則臣希臘，大夏月氏來則臣大夏月氏，嚙唃來則臣嚙唃，九姓昭武來則臣九姓昭武，突厥來則臣突厥，大食來則臣大食。雖屢易其主，而人民之營其生活也如故。當時統治者與被治者間，言語風俗，固有不同，而統治一級，人數較少，或武力雖優而文化較劣，狎居既久，往往與被治者相融合，故此土之言語風俗，非統治者之言語風俗，實被治者之言語風俗也。」

然則論西胡之事，當分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二級觀之，否則鮮不窒閼矣。」

王氏之說確屬的論，茲將昭武九姓各國在唐時之情況敘述如下。

據史傳所載<sup>41</sup>昭武九姓各國之情況大致如次：康國其土地肥沃宜禾、出善馬，兵強於諸國，其人嗜酒、好歌舞於道，王帽氈飾金雜寶，女子盤髻蒙黑巾，綴以金礪（音花，古花字）生兒以石蜜啖之，置膠於掌，欲長而甘言。……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國，利所在無不至，以十二月為歲首，尚浮圖法，祀祆神<sup>42</sup>，出機巧技，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為樂。唐太宗李世民貞觀五年（西元 631 年）康國請臣於唐，唐太宗曰：朕惡取虛名，害百姓，且康臣我，緩急當同其憂。師行萬裏寧朕志邪，卻不受。至唐玄宗李隆基開元時（西元 713-741 年）曾貢多種方物及胡旋

<sup>41</sup> 此處皆據《新唐書》卷二二一下康國傳，不另一一加注。

<sup>42</sup> 祆神，即祆教，俗稱拜火教、明教，牟尼教、火祆教等，為波斯人摩尼（Mani, 215-276 年）所創，詳情請參看羅竹風主編之《宗教通史簡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1990 年，頁 528-534。

女<sup>43</sup>。

安國，一日布豁（*boukhara*，即後世之不花刺），又曰補喝，西頻烏澹河（*oxus*，即阿姆河），以阿濫湫城爲都，有大城四十、小堡千餘；募勇健爲柘羯<sup>44</sup>，唐太宗貞觀時貢方物，此布豁者亦稱小安國。東安國或稱小安或曰喝汗，有大城二十，小堡百。唐高宗李治顯慶（西元 656-661 年）時，以阿濫湫城爲安息州，以其安國王昭武殺（昭武其性，殺爲名）爲刺史，以雙斤（東安都城）爲木鹿州，並以東安王昭武閉息爲刺史。

東曹或稱率都沙那、蘇對沙那、劫布咀那<sup>45</sup>、蘇都識匿凡四名、唐高祖李淵武德（西元 618-626 年）中，與康國同遣使貢方物，唐封其王哥邏僕羅爲懷德王，天寶十一年（西元 752 年）東曹王爲設阿忽與安請擊黑衣大食<sup>46</sup>，唐玄宗慰之而不聽。

石國（*tachkend*）或曰柘支、柘折、曰赭時，漢時在大宛北，唐高祖、太宗時，數度遣使貢方物，高宗顯慶三年（西元 658 年）以瞰羯城爲大宛都督府，封石國王瞰土屯攝舍提於屈昭穆爲都督。開元（西元 713-741 年）初封其君賀咄吐屯，以其有功爲石國王，開元二十八年（西元 740 年）又冊爲順義王，次年石國王伊捺吐屯屈勒上書唐廷略以今突厥已屬天可汗，惟大食爲諸國患，請討之，玄宗未之許。

米國或曰彌末，或曰弭秣賀，唐高宗永徽（西元 650-655 年）時爲大食所破，至高宗顯慶三年（西元 658 年），以其地爲南湽州<sup>47</sup>，授其君昭武開拙爲州刺史，自是朝貢不絕。唐玄宗開元（西元 713-741 年）時，獻壁舞筵師子、胡旋女，開元十八年其大首領末野門來朝，天寶（西元 742-755 年）初，封其君爲恭順王，母可敦爲郡夫人。

何國或曰屈霜你迦、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Byzance*，指拜占庭東

<sup>43</sup> 胡旋女，善跳旋轉舞之胡族女子。

<sup>44</sup> 柘羯或作赭羯，皆波斯語 *tchakar* 之不同音譯，此名在康居訓爲衛士。

<sup>45</sup> 劫布咀那係中曹，《新唐書》誤爲東曹，《大唐西域記》曹國，詳見沙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中華書局 2004 年，頁 129。

<sup>46</sup> 在巴格達之阿巴斯王朝稱黑衣大食。

<sup>47</sup> 既能以其地爲南湽州，並授米國王昭武開拙爲州刺史，其間唐與大食必有一戰，且唐獲勝，否則何能以其地爲州，惜《新唐書》未載戰勝之事。



羅馬而言)等君王像,從此項記載也可證本身民族意識並不強烈,易向強力屈服。貞觀十五年(西元 641 年)遣使者入朝,高宗永徽時(西元 650-655 年)曾上書唐廷稱聞唐出師西討,願輸糧於軍,未幾唐以其地爲貴霜州,授何國君昭武婆達地爲州刺史,何國則遣鉢底失爲使入謝。

史國或曰卻佉沙、羯霜那,國有城五百,隋煬帝楊廣大業(西元 605-616 年)中,史國君狄遮始通中國,唐貞觀十六年(西元 642 年),史國君沙瑟畢遣使獻方物,高宗顯慶(西元 656-660 年)時,以其地爲佉沙州,授史國君昭武失阿喝爲刺史;玄宗開元十五年(西元 727 年)史國君忽必多遣使獻舞女、文豹;後君長數死立,然首領時時入朝,天寶中詔改史國爲來威國。那色波(Nakhschab)亦曰小史,居吐火羅故地,東阨葱嶺、西接波刺斯(Perse)、南雪山,自南山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則爲六世紀末(西元 580 年)西突厥汗國之西界<sup>48</sup>。

昭武九姓諸國於歷史上曾分別受突厥,大唐、大食之統治;突厥與大食統治時之情況與本文無關,不贅述,被大唐統治時期,綜合上列史料,昭武九姓諸國成爲大唐之羈縻地區,其行政區劃分爲府、州兩級,各冠專名,茲將之分列如下:

石國—大宛都督府、

康國—康居都督府、

米國—南謐州、

史國—佉沙州、

何國—貴霜(當係貴霜匿)州、

安國—安息州、

東安—木鹿州。<sup>49</sup>

昭武九姓諸胡王受大唐冊封,府設都督、州設刺史,概以原有之諸胡王爲都督或刺史,如石國設爲大宛都督府,封其王爲都督、東安國設爲木鹿州,授其王昭武閉息爲刺史等,進行間接統治,係屬羈縻性質,略近於

<sup>48</sup> 季羨林校注《大唐西域記》上冊頁 99。

<sup>49</sup> 《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頁 7。

中國歷代「治邊」政策中之「捨虛名而就實利」<sup>50</sup>僅維持名義上之統治，不過昭武九姓諸胡國多有送質子入唐之制，依近年大陸出土之墓誌等資料，發現何、米兩國送子入唐爲質之事，茲從資料中找到二例，其一「何文哲墓誌」有：「前祖以永徽（唐高宗李治年號，相當西元 650-655 年）初，款塞來質，附子王庭。簪纓因盛於本朝，爵賞由光於中土。」<sup>51</sup>另一例爲「米繼芬墓誌」有：「父諱突騎施，遠慕皇化，來于王庭，邀質京師，永通國好。特承恩寵，累踐班榮，歷任護國大將軍。公承質子，身處禁軍。孝以敬親，忠以奉國。」<sup>52</sup>可見米繼芬乃質子突騎施之子，突騎施死，米繼芬繼爲質子，無論何文哲或米繼芬，從其姓名觀之，已然相當程度之華化，此兩人均死葬中國，想必其後人也留中國，久之自己入融漢人之中矣！

#### 四、昭武九姓胡之若干習俗

民族之區隔，血緣固爲因素之一，但並非主要因素，尤非唯一因素，文化習俗實居於更重要地位，是以春秋戰國時，區隔華夏與夷狄者，文化習俗遂成爲識別之主要原素，以是乃有「夷狄入於華夏者，則華夏之；華夏入於夷狄者，則夷狄之。」之說法，昭武九姓胡之所以繼承「胡」之稱號，實以其文化習俗與華夏（或後代所謂之漢人，不過漢人因時代不同，而有不同之內涵，詳見拙撰《中國文化史講稿》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5 年 5 月，頁 6）有所不同，惟目前所擁有資料尚不足深入探討，而作者於中亞諸族文字未曾研習，僅能就手邊有限資料，就昭武九姓諸胡之習俗酌爲介紹，惟有一前提需先爲說明者，亦即任何民族之習俗，之所以能存在對該民族而言，皆有其正當性，切不可因閱讀者不同民族之立場，妄加比較評論，如此探討不同民族習俗時，始不至有價值性之論斷，在基本邏輯上有所謂異類不比，正是此意。

<sup>50</sup> 胡耐安《邊政通論》胡師 1959 年自行出版，後於 1968 年台灣商務修訂出版，另劉學鈞《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也論及歷代治邊政策，臺北知書房 2005 年 9 月出版。

<sup>51</sup> 原件見盧凡蔭〈何文哲墓誌考釋〉刊《考古》1986 年第 9 期頁 846，但此處係轉引自注 48 所列書頁 7。

<sup>52</sup> 閻文儒〈唐米繼芬墓誌考釋〉刊《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2 期頁 154，此處轉引同注 49。

### (一) 婦女地位

婦女居人類之半，照理其地位應與男性相等，但人類自母系社會轉入父系社會後，女性地位甚難與男性相提併論，在國史上此種情形甚至可視為「常態」，因此對諸胡列國南北朝時，北方諸胡族政權控制下婦女之若干活動，被視為相當怪異，而加以載錄<sup>53</sup>，此種北方胡族習俗，在昭武九姓諸國中更為常見，早在漢代，自大宛至安息諸西胡，婦女在家庭中均具有相當地位，史傳稱其「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sup>54</sup>昭武九姓於此傳統也仍予維持，如安國國君「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sup>55</sup>西元 719 年（唐玄宗開元七年），安國國君篤薩波提遣使上貢表「妻可敦」併列名進奉<sup>56</sup>，復如粟特銅幣編號 1482 及 1484 兩枚，正面均刻國君，可敦併列之頭像<sup>57</sup>，凡此均可像徵其對婦女地位之重視。另者唐玄宗時安祿山（其先係來自康國，後改姓安），相傳為楊貴妃之義兒，「每對見，先拜太真（即楊貴妃），玄宗問之，奏曰：蕃人先母後父耳！玄宗大悅」（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15 有「胡人先母後父」，僅有一字之差）。論者或以此乃昭武九姓胡社會仍保有母系社會之痕跡，但就人類發展趨勢，人類行采集生活時多為母系社會，其後采集生活無法滿足日漸增多之人口，遂根據各民族生息空間之自然條件，或向遊獵、遊牧方式發展，或向農業方式發展，就常態而言，草原地區由於地上物質缺乏，理應較早進入需要較多力量之遊獵、遊牧生態，也即較早進入父系社會，其婦女所以具有較高地位，應為出於對婦女之尊重，而非母系社會現象之遺留，是耶？非耶？仍有探討空間。

### (二) 宗教信仰

大體而言，整個北亞各民族之最初信仰皆為泛靈式之薩滿信仰<sup>58</sup>，無

<sup>53</sup> 北朝婦女甚多參予其夫或其子之政壇升遷，或從事騎射等「傳統」男性活動，且善妒禁夫娶妾等，詳見顏之推《顏氏家訓》相關篇章。

<sup>54</sup> 《史記·大宛列傳》卷 123。

<sup>55</sup> 《隋書》卷 83。

<sup>56</sup> 《冊府元龜》卷 999。

<sup>57</sup> 轉引自《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頁 19。

<sup>58</sup> 「薩滿」一詞為烏拉阿爾泰語系阿爾泰語族滿洲語女巫之意，而薩滿信仰係認為萬物有靈，人與神靈之溝通需透過薩滿，詳情請參見富育光《薩滿教與神話》，遼寧

論匈奴或大月氏民族自不例外，但大月氏西遷河中地帶後，由於該地區位處波斯、印度、歐洲及中國諸大文化之間，大月氏後裔之昭武九姓諸國自不得受上述諸大文化之影響，因此在宗教信仰上既有源自遠古之薩滿信仰，而創自印度之佛教，源於波斯之祆教（參見注 42）也予月氏昭武九姓諸國以莫大之影響，甚至基督教之聶斯托里斯教派也予昭武九姓若干影響，不過仍以祆教最具聲勢，昭武九姓諸國受其影響也最大，如康國或作薩末鞬、颯秣建（**Samarkand**），則有「尙浮圖法，祀祆神」<sup>59</sup>，以言曹國則有「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sup>60</sup>上引康國之「尙浮圖法祀祆神」顯然為佛教祆教並行，而曹國之得悉神，則很難定位為佛教或祆教之神祇，必也其或為傳統薩滿教之神祇。另東曹國（或曰率都沙那）在史傳中則有如下之記載：「南至吐火羅五百里，有野義城，城有巨窟，嚴以關鑰，歲再祭，人向窟立，中即煙出先觸者死。」<sup>61</sup>此種傳言是又係薩滿巫之作爲。此外於史國（或曰佉沙）在近吐火羅處有鐵門，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鐵，為關以限二國，以金錮闔，城有神祠，每祭必以千牛羊，用兵類先禱乃行<sup>62</sup>，是可以斷定其為薩滿信仰之血祭形式。另據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載有唐時昭武九姓諸國流行祆教之情形如次：

「……此六國（指昭武之安、曹、史、百驪、米、康而言）總事火祆（按即祆教），不識佛法。唯康國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敬也。」

此為西元八世紀初之情況，前此百年也即七世紀初唐僧玄奘於其《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所載康國情況為：

「（康國）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為道（按祆教又稱

大學出版社出版，1990 年。

<sup>59</sup> 《新唐史》卷二二一下，另沙畹著，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引《新唐書》則加注釋。

<sup>60</sup> 《隋書》卷八三。

<sup>61</sup> 《新唐書》卷二二一下。

<sup>62</sup> 同注 57 所引書。

火祆教，以火代表光明，故崇拜之）。有寺兩所（百年後則僅有一所）迴無僧居。客僧投者，諸胡以火燒逐，不許停住。」

兩相比較可見到一世紀來祆教長佛消之情況，此外，玄奘、辯機之《大唐西域記》曾載有今錫爾、阿姆兩河間昭武九姓諸國多有火祆教神祠，可見其時，昭武九姓諸國受波斯祆教影響甚大，其後由於大食（阿拉伯）勢力進入，始逐漸轉而改宗伊斯蘭教。

### （三）婚姻概況

人類婚形式是多樣性，但凡存在者，概屬合理，因此無論掠奪婚<sup>63</sup>、交換婚、買賣婚、服務婚、贅婚、典婚、冥婚、賜婚、收繼婚…<sup>64</sup>，既然能在人類社會草原游牧民族自有史以來（指以漢文載錄之文獻），即有收繼婚形式，也即父死繼承家族或汗國者，均可或均須娶其諸庶母，其所以如此者，有血胤及經濟兩方面之理由，前者惡家族或統治階級血統之紊亂，後者則為免於財產之分散，關於此點《史記》、《漢書》中行說（讀若中杭悅）說之極詳，於此不多加論述，要之，古往今來人類各種婚姻形式均有其合於時空之需要，無所謂對錯，更不宜以己度人，斥之為違倫悖理。

能本諸上述認知，以之探討西遷中亞昭武九姓諸國之婚姻制度，始不致落入傳統全然以負面詞彙敘述之窠臼，抑有進者，無論中外，婚姻在近百年之前，幾與愛情無關，戀愛幾乎均始於結婚之後，在百年之前婚姻乃兩個家族、兩個部落或兩個國家之事，前文所敘漢以細君公主嫁烏孫昆莫，何嘗與愛情有關，純然基於大漢帝國政治需要，漢人如此，昭武九姓諸國也難例外，昭武九姓諸國王室彼此互為婚姻，透過婚姻關係，使各國關係更為融洽，據既有文獻可得以下二例，其一，《隋書》卷八三載安國王設立登娶康國王之女，《隋書》原文為「（安國）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立登。妻，康國王女也。」其二，康國大首領康染干娶石國王之女，《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原文為「天寶二年（西元 743 年），石國

<sup>63</sup> 縱然時至今日，吉爾吉斯仍有掠奪婚之事實存在，見 2005 年 5 月 1 日聯合報第 14 版。

<sup>64</sup> 蘇冰、魏林《中國婚姻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

王特勤遣女婿康國大首領染顛獻物。」此種互為婚嫁之情形，在昭武九姓諸國之間，可能屬於常態。其後突厥勢力進入中亞後，昭武九姓諸國為求自身之安全，復又與突厥聯姻，就目前文獻中也可尋得以下二例：其一，康國王世失畢（《唐書》等史料作代失畢，蓋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易世為代）娶西突厥可汗達頭（或作達度，即室點密之子）之女，《隋書》卷八三原文為：「（康國）王字世失畢，為人寬厚，甚得眾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其二，康國王屈術支娶西突厥葉護（也作統葉護）可汗女，遂臣於西突厥。《舊唐書》卷一九八原文為：「隋煬帝時（西元 605-616 年），其（指康國）王屈術支娶西突厥葉護可汗女，遂臣於突厥。」可見以婚姻作為政治手段，中外固頗一致。不僅如此，據納爾沙希之《布哈拉史》，弗賴譯註本（Frye, The History of Bukhara）麻省劍橋 1954 年版，頁 40-41，更記載西元 683 年（唐高宗李治弘道元年，弘道僅有一年），安國女王為抵禦大食之入侵，不惜以身相許換取康國王突昏出兵相援<sup>65</sup>。凡此等等似可視為中原「和親」之擴大版。

至於一般社會也仍有收繼婚存在，其原因前已敘及，至於杜環之《經行記》〈天寶中期〉中所稱「極惡風俗，婚姻雜交，納母及姐妹為妻」或僅為某一特例，自不得作唐時昭武九姓諸國婚姻之正常形態。

#### （四）昭武服飾

服飾為文化具體表徵之一，關於昭武九姓諸國之服飾，向乏具體文獻可供參考，但從若干文獻中之零星記載，仍可對昭武九姓諸國之服飾，有一概括之瞭解，唐人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一詩，對昭武諸胡之衣著有適當之描述，此詩全文如下：

石國胡兒人見少，蹲舞樽前急如鳥。

織成蕃帽虛頂尖，細疊胡衫雙袖小。

手中拋下葡萄盞，西顧忽思鄉路遠。

跳身轉轂寶帶鳴，弄腳繽紛錦靴軟。

四座無言皆瞪目，橫笛琵琶偏頭促。

<sup>65</sup> 此項史料係轉引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一書頁 22。

亂騰新毯雪朱毛，傍拂輕花下紅燭。

酒蘭舞罷絳管絕，木槿花西見殘月。<sup>66</sup>

此處「石國胡兒」正是指昭武九姓之石國，從此詩中可以看出跳胡騰舞之石國胡人其所戴之帽為「虛頂尖」，也即其帽尖頂，與頭部有相當空隙，其所以尖頂者，使不易積雪；至於衫，前詩有「胡衫雙袖小」句，唐玄奘西行時曾親見之，於其《大唐西域記》中也稱「裳服褊急」<sup>67</sup>，所謂褊急者，正是侷促狹小之意，其所以雙袖小者，便於行動，北亞草原諸游牧民族服飾多為雙袖小之形式，如《楚辭》稱「小袖秀頸，若鮮卑只」，可見鮮卑族服飾也為雙袖窄小。至於前詩中之「寶帶鳴」句，說明石國胡人繫有腰帶，按北亞草原諸游牧民族幾乎均繫腰帶，早期鮮卑族也用腰帶，甚至「鮮卑郭洛帶」即指腰帶而言<sup>68</sup>，基於生活之需要，在腰帶上可以掛上佩劍、刀、打火石等日常必需品，稍為富貴之人在腰帶上鑲以寶石，故稱寶帶；前詩末句「錦靴軟」可知石國胡人足上所穿者為靴而非鞋。自然欲從一首詩探索一個民族之服飾，實乃不可能之事，但在缺乏更多文獻下，能憑此詩對昭武九姓之石國服飾，作一輪廓性之瞭解，雖未必憑一斑而能窺全豹，但也聊勝於無。另據《大唐西域記》卷一曾提及昭武九姓諸國在服飾色澤上為「吉乃素服，凶則皂衣」，皂者黑色也，可見其服飾色澤以素色為吉，黑色為凶，聊為補充。

### (五)節慶商販

昭武九姓諸胡之節慶在我國文獻中，可尋得者計有歲首節、求天兒骸骨節、祭祖節及乞寒潑水節（見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其中歲首節類如各民族之新年，祭祖節，顧名思義為祭祀祖先之節日，類如漢人之祭黃陵，昭武九姓諸胡國唯康國馬首是瞻，而昭武九姓係大月氏之後，大月氏先後受匈奴及匈奴支持下烏孫之攻擊，始西遷錫爾，阿姆河流域，而分為九姓諸國，對大月氏原領袖自有思念之情，據《隋書》卷八三

<sup>66</sup> 見《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出版，頁5323-5324。

<sup>67</sup> 《大唐西域記》卷一《率利地區總述》，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72。

<sup>68</sup> 可參見馬長壽《鮮卑與烏桓》上海人民，1962年，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方壯猷譯）上海商務，1934年，劉學鈔《鮮卑史論》臺北南天，1994年。

載有：「（康）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昭武九姓）諸國皆來助祭。」可見其祭祖節為六月。漢人以農曆四月初五（四）清明，為祭黃陵之期，昭武九姓諸國以六月為祭祖之期，有何特別意義，以文獻無徵，難作推論。

求天兒骸骨節，據《通典》卷一九三載昭武九姓諸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胸哭號，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據此似可推測係薩滿信仰之遺跡，而此散失骨骸之天兒，究係何神，中文文獻未載，惟曾有西方學者亨寧於其所撰〈粟特神考〉（戴倫敦大學《東方非洲研究院院刊》第 28 卷第 2 期，1965 年，第 252 頁，W.B.Henning, A Sogdian God, BSOAS, vol. 28 pt. 2）<sup>69</sup>一文稱此天兒為「阿多尼耽末子」（Adonis Tqmmuz），復指此天兒係源自巴比倫。昭武九姓諸國位處中亞兩河之間，西受巴比倫、南受波斯印度、東受中國之影響均有可能，而其自身復為月氏之後，月氏原在敦煌、祁連間，在北亞草原邊緣，受泛靈信仰之薩滿影響，也難以排除，其實際情況究竟如何？現已難以探究，尤其自大食勢力進入改宗伊斯蘭後，對舊有含信仰性之習俗，每多刻意予以剔除，欲求真象難上加難。

至於乞寒潑水節，係在隆冬十一月舉行，據《新唐書》卷二二一下〈康國傳〉載：「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為樂。」《文獻通考》樂考卷二一對此有進一步之描述：「乞寒本西國外蕃，康國之樂，其樂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箏篴、笛。其樂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十一月係在隆冬，裸露形體潑水乞寒，必有取樂之外之含義，據稱波斯薩珊王朝卑路斯在位期間（西元 459-483 年），出現苦旱，幸得卑路斯王於十月三十日出而拯救，粟特地區始免於苦旱，之後遂於十一月相互潑水以為紀念，此種說法確否待考，惟至少說明昭武九姓諸國位處中亞易受各方文化之影響。此潑水乞寒舞於衢路且裸露形體，鼓舞跳躍，顯然有薩滿巫「跳神」韻味，依據文獻所載其跳躍形狀，筆者數年前曾親見布里雅特蒙古薩滿舞，兩者有其相似之處。此種隆冬潑水乞寒之舞，自昭武九姓諸國逐漸隨其人之東來而流傳中國，唐時長

<sup>69</sup> 係轉引自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一書頁 34。



安也流行此種舞蹈，唐中宗李顯對此種「胡戲」頗為欣賞，由於跳此舞者皆為胡人（極可能為昭武九姓諸胡），故又稱之為「潑寒戲胡」，其所配之音樂則稱之為「蘇幕遮」，其舞則稱之為「脫渾」，「蘇幕遮」或作「蘇莫遮」、「颯磨遮」、「蘇摩遮」，其語源可能出自天竺（今印度），傳入昭武九姓諸國後，再傳入龜茲，然後進入中原，唐詩人張說曾有一詩道出「蘇摩遮之由來，共五首如下：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服紫髯鬚。

聞道皇恩遍宇宙，來將歌舞助歡娛。

繡裝帕額寶花冠，夷歌騎舞借人看。

自能激水成陰氣，不慮今年寒不寒。

臘月凝陰積帝臺，豪歌急舞送寒來。

油囊取得天河水，將添上壽萬年杯。

寒氣宜人最可憐，故將寒水散庭前。

惟願聖君無限壽，長取新年續舊年。

昭成皇后帝家親，榮樂諸人不比論。

往年霜前花委地，今年雪後樹逢春。

按張說（西元 667-730 年）歷經唐高宗、武周、中宗、睿宗至玄宗，正是盛唐時節，其詩所記長安胡人乞寒情況，可見此俗已然傳入中國。其後若干「衛道」之士以其赤身裸體有失體統，遂透過各種方式加以禁絕。

昭武九姓諸國均善於商賈，康國為昭武九姓之首，據《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載有：「康者，…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國，利所在無不至。」康國既如此，其餘諸國莫不皆然，然而欲離開兩河地區向外貿販有無（兩河之間同質性極高，不易發生商業活動），如向東方之中國應屬獲利最大者，因此自漢武帝鑿通西域形成絲綢之路後，昭武九姓諸國位處中國、歐洲、波斯之間，扼絲綢之路西端，配合昭武九姓諸國之民族性，遂大量向中國湧入以販買各物從中獲利。然而雖有絲綢之路，但萬里迢迢，風險極大，除沿途自然條件有其險惡性外（此點可自《西游記》中看

出），某些路段且有盜匪出現，設若人數較少之胡商，往往被盜匪所劫殺，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即載有「時同侶商胡（按胡商，唐時習以商胡稱之）數十，貪先貿易，夜中私發，前去十餘里，遇賊劫殺，無一脫者。」可見萬里經商風險極大，前稱「同侶商胡數十」，仍為少數，以致遇匪被劫殺，竟無生還，因此欲到中國經商，必須百多人甚或數百人結伴同行，並由其中既有經驗復強而有力者為首，沿途更須聽從此首領之指揮，此首領往往稱假王，既至中國又常冒稱係某國之使者，前來貢獻，而中國邊臣疆吏則投君王好大喜功心理，為之上奏朝廷，由是國史上每多諸國遣使朝貢之記載，其中確為外國所派遣之使者固然不少，但為胡人商隊「假王」所冒稱者，為數可能更多，其所以如此者，一則深知中原帝王為示國家富庶，往往對來使之賞賜超過其所「貢獻」之方物，數倍或數十倍，甚或更多，因此願冒稱為使者；二則，冒稱使者一旦為中國官方接受（事實上幾無不被接受），則其商隊所攜來之貨物極易出售，獲利自然暴增，此等與史傳所載「……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國，利所在無不至。」正合。《大唐西域記》也載有「…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父子計利，則多為貴，良賤無差，雖富巨萬，服食鹿麋，力田逐利者雜半矣。」<sup>70</sup>《唐會要》卷九九〈康國條〉也載有「深目高鼻，多鬚髯，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膠置手內，欲其成長口嘗甘言，持錢如膠之粘物。習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國。利之所在，無所不至。」昭武九姓諸國胡既以「財多為貴，由是衍生出一種「鬥寶」之俗，據《太平廣記》卷四〇三〈原化記〉載有「胡客法（指在華之九姓胡人習俗），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各閱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座上，其餘以次分列。」可見昭武九姓諸國以財富定其社會地位，此種習俗已隨昭武九姓胡人自兩河地區，而至中原。隨唐時已有甚多昭武九姓胡人定居中原，隨之而來者甚多昭武九姓胡人習俗。昭武九姓諸國既極重商，可能衍生出質借或典當作法，漢地之有典當、質押、或許即由九姓胡商所攜來者，當然，此點僅為筆者之推測，確否，仍有待考證。

<sup>70</sup> 《大唐西域記》卷一，〈率利地區總述〉

## 五、昭武九姓與唐之關係

大月氏自西遷河中地區後，由於土地肥沃、適於農業，經百餘年之調適，已自游牧而改爲農耕生計，不復在意其先祖被匈奴、烏孫攻擊之仇恨，以致漢時張騫出使西域欲聯大月氏共擊匈奴，未獲回應，大月氏既安於立國河中地區，分其國爲五翎侯（或作翕侯，即後來突厥之葉護），約在西元一世紀初（西元 24-25 年）五翕侯之一丘就卻統一其餘四翕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kusana），但漢文史料仍稱之爲大月氏。丘就卻信奉佛教，自稱「正法之保護者」<sup>71</sup>，按佛法本以慈悲爲懷，但丘就卻皈依佛教之後，卻大事向外擴張，至西元 52 年時，已然成爲中亞大國（約當東漢光武帝劉秀建元後期，按建元自西元 25 年至 56 年），可見雄才大略者運用宗教，愚蠢怯弱者被宗教束縛。丘就卻享壽至八十多歲，死後由閼膏珍嗣立，更開疆拓土及於印度河，史稱「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sup>72</sup>，《後漢書》則稱之爲「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閼膏珍之後由迦膩色加（kanishka）嗣立，更將貴霜王國推向空前之繁榮，迦膩色加更爲崇信佛教，也更爲運用宗教，渠曾在健陀羅興建規模宏大之寺廟與佛塔，其佛塔名爲「雀離」，號稱百丈浮屠<sup>73</sup>。自丘就卻以至迦膩色加一個多世紀，貴霜佛教僧侶來華傳佈佛法，在漢文史料中凡以支（大月氏人來華者，均稱其爲支姓）、安爲姓者（安者指昭武九姓之安國或指安息），均係昭武九姓胡僧，如支婁迦、支旦、支亮、支謙、安世高、安玄等，其來自康者，則以康爲姓，如康巨、康孟祥。

貴霜王國自迦膩色加之後盛極而衰，分列爲昭武九姓諸國，自東漢以來即與中原時有往來，及至唐代關係更爲密切，按唐李淵起事之初，曾借兵於突厥，若干文獻更指唐初曾稱臣於突厥，可見六、七世紀時突厥勢力極盛，初貴霜就弱之後嘯噓崛起，力量及於河中地區，突厥興起後，復取

<sup>71</sup> 此句出現於其所發行錢幣上，見王治來、丁篤本《中亞國際關係史》，湖南出版社，1997 年，頁 17-18。另《中亞文明史》第二卷第十一章 B.N.普里〈貴霜人〉，頁 189，則指錢幣上之銘文爲「諸王之王，偉人，救世主」

<sup>72</sup> 陳壽《三國志》引《魏略西戎傳》

<sup>73</sup> 《中亞文明史》第十五章 G.A.普加欽科娃，S.R.建爾 R.C.夏爾瑪 M.A.喬延達（貴霜藝術）頁 259-315，對其時佛教塔及相關藝術有詳盡介紹，此處不多作引述。

嚙噠而代之統有中亞河中一帶，於是昭武九姓皆臣於突厥，及唐太宗李世民嗣立（西元 627-649 年），恥於前此之仰賴突厥鼻息，勵精圖治乃擊突厥，終滅東突厥，再威服西突厥<sup>74</sup>，於是原臣服於西突厥之昭武九姓諸國，遂臣服於大唐帝國，唐帝國遂在其地設置都督、府、州、縣之行政組織<sup>75</sup>，此種情形自太宗、高宗、武后、而中宗、睿宗至玄宗而未變，但正在此時西亞大食藉伊斯蘭教帝國澎勃發展，向各處擴張，使中亞形勢發生重大變化。

伊斯蘭教雖創立於穆罕默德，並奠下向外擴張之基礎，但真正大肆擴張則為繼承穆罕默德之諸哈里發<sup>76</sup>，西元 642 年滅波斯，此時為唐太宗貞觀十六年，中國昭武九姓諸國面對西方之強國大食、東方正崛起如日中天之大唐帝國，其處境自是極為艱辛。幸此時大食本身因爭奪哈里發而發生若干變化，稍為延緩東掠行動，大唐帝國則趁時進入昭武九姓聚居地區，唐高宗時幾完全掌控河中地區，並在其地設置都督府、州、縣。但好景不長，大食帝國內部幾經爭奪，最後由麥加地區古萊什部後起之望族伍麥耶統一大食（或稱之為倭馬），建立伍麥耶王朝（西元 661-750 年）復向東擴張其勢力已達河中地區，其時約當唐玄宗時（西元 712-756 年），玄宗開元（西元 713-741 年）初，康國王烏勒伽<sup>77</sup>，即曾與大食作戰，不能勝，遣使大唐乞師，玄宗未之許<sup>78</sup>，蓋其時唐之實力已大不如前，由是河中地區遂漸落入大食之手，終至全部伊斯蘭化，中國力量從而退出昭武九姓諸國。

前此昭武九姓諸國與唐朝曾有密切之關係，茲分以下諸項略作介紹：

<sup>74</sup> 關於西突厥之興衰可參見沙畹著、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商務印書館，1932 年出版，（1958 年北京中華書局重行出版，2004 年北京中華書局二度修訂再予出版）此處不作詳述。

<sup>75</sup> 詳情可參見《資治通鑑》頁 6317-6323。按歷代正史，《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早有標點本面世，此間所有各書局均據之影印出版，再提書局已無版本學之意義。

<sup>76</sup> 哈里發，為阿拉伯語其意為「安拉使者的繼任者」，安拉或作阿拉，係伊斯蘭教中認為宇宙間唯一之真主，在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則稱安拉為「胡大」。關於哈里發之意請見努爾曼，馬賢著《伊斯蘭教常識問題》，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

<sup>77</sup> 此為新唐書之名，《唐書》則作烏勒，皆 Ghourek 之音譯。

<sup>78</sup> 見《新唐書》卷二二一下。

## (一)九姓胡入貢大唐及貢品

自東西魏分裂再蛻化爲北齊、北周後，突厥強大，北齊、北周爭事突厥，突厥更掩有昭武九姓諸國，但自隋代以來，已有實力抗衡突厥，惟李淵起事之初，仍借兵於突厥，但已與康國有所往來，據《新唐書》載唐高祖李淵武德十年（西元 627 年），康國始遣使來獻，《舊唐書》則稱是年（康國王）屈朮支遣使獻名馬，自是之後昭武九姓諸國常遣使來華，茲爲明瞭起見將進貢國、貢期、貢使及貢品以表列方式呈現如下：

貢國	貢期	貢使	貢品	備註
康國	唐高祖武德十年(627)		馬	一、本表轉錄自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一書，頁 49-52。
何國	太宗貞觀元年(627)五月			
康國	太宗貞觀元年(627)五月			二、高祖武德十年，蔡書作武德七年，茲據新舊《唐書》更正爲十年。
石國	太宗貞觀八年(634)十二月			
康國	太宗貞觀九年(635)		獅子	
康國	太宗貞觀十一年(637)		金桃、銀桃	
安國	太宗貞觀十二年(638)十一月			三、兩唐書言明始遣使來獻，是蔡書原列武德九年十二月之貢使刪。
康國	太宗貞觀十三年(639)二月			
康國	太宗貞觀十六年(642)正月			四蔡書曹國於武德七年七月遣使來朝因《新唐書》有「西曹者，…武德中入朝」按武德中應爲
曹國	太宗貞觀十六年(642)正月			
史國	太宗貞觀十六年(642)正月			
康國	太宗貞觀十七年(643)正月			
康國	太宗貞觀十八年(644)正月			
康國	太宗貞觀十九年(645)正月			
石國	太宗貞觀二十年(646)正月			
石國	太宗貞觀二十一年(647)正月			
康國	太宗貞觀二十一年(647)正月			
康國	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正月			
石國	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正月			
安國	太宗貞觀二十三年(649)二月			

貢國	貢期	貢使	貢品	備註
曹國	高宗永徽三年(652)十月			武德五年（西元 622 年）也非武德七年，全刪。
曹國	高宗永徽四年(653)十一月			
曹國	高宗永徽五年(654)四月			
康國	高宗永徽五年(654)四月			
安國	高宗永徽五年(654)四月			
康國	高宗咸亨二年(671)三月			
康國	調露元年(679)十月			
石國	永淳元年(682)九月			
安國	武周萬歲通天二年(697)四月			
康國	中宗神龍三年(707)六月			
安國	玄宗開元五年(717)三月			
康國	玄宗開元五年(717)三月			
米國	玄宗開元六年(718)二月			
石國	玄宗開元六年(718)二月			
米國	玄宗開元六年(718)四月			
康國	玄宗開元六年(718)四月			
安國	玄宗開元七年(719)二月			
康國	玄宗開元七年(719)二月			
石國	玄宗開元八年(720)十二月			
石國	玄宗開元九年(721)二月			
康國	玄宗開元十二年(724)四月			
安國	玄宗開元十四年(726)二月			
安國	玄宗開元十四年(726)五月			
康國	玄宗開元十五年(727)五月			
史國	玄宗開元十五年(727)五月			
安國	玄宗開元十五年(727)五月			
史國	玄宗開元十五年(727)七月			
米國	玄宗開元十五年(727)十一月			
米國	玄宗開元十六年(728)四月			

貢國	貢期	貢使	貢品	備註
米國	玄宗開元十七年(729)正月			
米國	玄宗開元十八年(730)四月			
石國	玄宗開元十八年(730)四月			
安國	玄宗開元二十八年(740)十月			
康國	玄宗開元二十八年(740)十月			
史國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三月			
曹國	天寶元年(742)三月			
石國	天寶元年(742)三月			
石國	天寶二年(743)十二月			
安國	天寶三年(744)三月			
康國	天寶三年(744)七月			
史國	天寶三年(744)七月			
西曹國	天寶三年(744)七月			
米國	天寶三年(744)七月			
石國	天寶三年(744)七月			
石國	天寶四年(745)七月			
安國	天寶五年(746)七月			
石國	天寶五年(746)閏十月			
石國	天寶五年(746)閏十月			
史國	天寶五年(746)閏十月			
米國	天寶六年(747)五月			
石國	天寶八年(749)八月			
康國	天寶九年(750)正月			
安國	天寶九年(750)正月			
康國	天寶九年(750)九月			
安國	天寶十年(751)九月			
康國	天寶十一年(752)十二月			
火尋	天寶十二年(753)五月			
安國	天寶十二年(753)七月			

貢國	貢期	貢使	貢品	備註
石國	天寶十二年(753)十二月			
米國	天寶十三年(754)四月			
康國	天寶十三年(754)九月			
康國	天寶十四年(755)三月			
火尋	天寶十四年(755)三月			
曹國	天寶十四年(755)三月			
康國	肅宗乾元年(758)六月			
安國	肅宗乾二年(759)三月			
石國	寶應元年(762)十二月			
康國	代宗大曆七年(772)十二月			
米國	代宗大曆七年(772)十二月			

從上表可知自唐高祖武德十年（西元 627 年）至代宗大曆七年（西元 772 年）之頭尾一百四十六年間，昭武九姓諸國遣使來華貢獻者共有九十次之多（其中固然有若干次係商隊假冒者），其中以康國 29 次居冠，此蓋康國為昭武九姓之首，石國十九次居次，其餘分別為安國十六次，米國十次，曹國（含西曹）七次，史國五次，火尋 3 次，何國 1 次，昭武九姓諸國與唐帝國之關係應屬相當不錯。不過吾人如從更寬廣之角度看，也即從大食伊斯蘭之崛起觀察，情況則與上述有所不同，按大食也即阿拉伯於西元 651 年（唐高宗李治永徽二年）滅波斯薩珊王朝，隨後即以中亞及河中地區為其東侵之目標，阿拉伯之東掠中亞大致可以西元七世紀下半及八世紀前半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阿拉伯之侵入中亞，仍未脫游牧民族掠奪習性，並未以傳播伊斯蘭教為目的，此一階段約當中國之唐高宗至武則天之間，因此從中國史料看，昭武九姓諸國仍與唐帝有九次遣貢獻之紀錄，且唐朝於高宗顯慶二年（西元 657 年）平定西突厥，至是在中亞設置象徵性之都督府等行政組織，並未實際統治昭武九姓諸國，且隨之吐蕃崛起，與突厥殘餘勢力結合，使唐朝窮於應付，更無餘力對中亞昭武九姓諸國進行實際之統治，如是乃引起阿拉伯勢力東來。西元 654 年（唐高宗永徽五年）阿拉伯人可能為進剿波斯王伊嗣俟餘眾，而進軍昭武米國及康國，但河中其他地區則遲至八世紀前半始受到全面之攻擊。其所以停頓數十年者



因阿拉伯人內部發生權力鬥爭，以致不暇向外發展。後一階段於八世紀初（西元 705 年）起，阿拉伯由哈加吉掌權，任命屈底波為呼羅珊總督，屈底波在任十年（西元 705-715 年）期間，吐蕃興起並介入西域事務，中國力量似已退出中亞，屈底波於西元 712 年征服康國之撒馬爾汗，經康國許以極多財物後，始退兵，從此也可看出此時阿拉伯對河中地區仍停留在以掠奪為目的。至西元 715 年屈底波與進入中亞之吐蕃勢力取得妥協，「共同」立阿了達為拔汗那王（古烏孫國），同年底屈底波死，吐蕃遂成為拔汗那之宗主。

唐帝國為抵禦吐蕃在中亞之發展，以維護唐帝國西方之安全及保證絲路之暢通，乃派安西副都護高仙芝率步、騎萬人前往中亞以申大唐之聲威，時為唐玄宗天寶六年（西元 747 年），大獲全勝，大唐聲威復振於中亞，但唐軍一退，阿拉伯復來，昭武九姓諸國不堪其擾，遂鼠首於兩端，至天寶九年（西元 750 年），高仙芝以石國王那俱車鼻施無蕃臣禮，上表劾之，那俱車鼻施懼乃約降，高仙芝乃遣使以獻俘方式送至開遠門，斬於闕下，由是九姓諸國皆怨，石國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邏斯城，高仙芝與戰大敗，未幾有安史之亂（安祿山、史思明皆昭武九姓之族裔），唐實力大衰，乃從中亞「退場」。

## （二）來華昭武九姓諸胡人及胡物

中國之有佛教，係由大月氏僧人介紹而來，而自張騫鑿通西域之後，昭武九姓諸胡人來華經商者，可說絡繹於途，另者，當大唐威震中亞河中地區時，昭武九姓諸國多有派「質子」來華，至於舞蹈、繪畫乃至雜技人才之來華者，更是所在多有，類此諸色人等，來華完成任務後，返回河中地區固然為數不少，但戀慕大唐安逸，繁榮而滯留不歸者，更是所在多有，載錄於漢文文獻者，大約均為出類拔萃知名之士，而未載錄於文獻者，應該為數更多，茲就文獻所載擇其要者酌為引敘，此項資料多為參考張星烺編注、朱杰勤校訂之《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理合加以說明。

## 甲、佛教僧侶

佛教係由大月氏僧人傳入中原<sup>79</sup>，此時已成為定論，大月氏後蛻化為昭武九姓諸國，東來之佛教僧侶也以昭武九姓諸國人為多，國人有一習尚對來華之外人，往往以其國家或部族名稱之首音（蓋外國部族名稱往往為複音、漢語為孤立語型，故多以其首音稱之），為來華者之姓氏，如來自康國、石國、米國、曹國、何國、高麗、大月氏…者，往往稱其姓康、石、米、曹、何、高、支…等，由是從漢文史料中不難看出唐時佛教僧侶之來自昭武九姓諸國，如（宋高僧傳）載有「釋神會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于岐，遂為鳳翔人矣。」按神會示寂於唐德宗貞元十一年（西元 794 年）享壽七十五歲，以此上推七十四年（中國算虛歲）為西元 720 年，為唐玄宗開元八年，神會誕生，其祖父時已徙居於岐應再往前推五十年，則應在唐高宗咸亨年間（西元 670-674 年），又其本姓石，可知其祖父本昭武石國人，則釋神會也昭武石國胡人。釋法藏字賢首，姓康，康居人也<sup>80</sup>。曾與玄奘、義淨共同從事佛經翻譯工作，據文獻載其「風度奇正利智絕倫，薄游長安，彌露鋒穎。」<sup>81</sup>，為華嚴宗第三祖，可見其也昭武九姓之康國胡人。釋僧伽者嶺北何國人也，自言俗姓何氏<sup>82</sup>，此人佛學道行高妙，被譽為「觀音菩薩化身」其為昭武九姓何國胡人無庸置疑。僧伽跋摩，康國人也，年少時自中亞渡流沙來華，具大修行，唐高宗顯慶時（西元 656-661 年），奉唐廷之命率隨從向西方諸國弘揚佛法，返回後復奉敕赴交趾采藥，僧伽跋摩心懷慈悲，看盡人間苦痛，悲心內結，常涕泣外流，時人號之為「常啼菩薩」。釋彌陀山，漢語稱之為寂友，睹貨邏國人也（即吐火羅，《大唐西域記》謂之宰利，地當今松河，楚河之間也大月氏之族），曾與法藏等譯《無垢淨光陀羅尼經》一卷，譯畢後向唐高宗辭歸睹貨邏，時「天后」武則天以厚禮餞之。

<sup>79</sup> 陳壽（三國志）卷三〇引魚豢（魏略）稱：「漢研帝（西漢研帝劉欣（元壽六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魏書、釋老志）作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按浮屠，復豆者，皆佛陀（buddha）之諧譯也。

<sup>80</sup>（佛組統紀）卷二九，法藏其祖康居國人，來居長安，法藏乃生於長安者。

<sup>81</sup>（宋高僧傳）。

<sup>82</sup> 何國也昭武九姓之一，《新唐書》卷二二一下〈康國傳〉稱：何國者，康之庶支也。此國《大唐西域記》作屈霜你迢國，去曹國（劫布嗣那國）西三百餘里，據西人考證，其他當今薩瑪爾汗與布哈拉之間之喀歇尼亞（kashania）。

## 乙、來華昭武九姓諸國胡人

昭武九姓諸國以康國爲尊，昭武九姓諸國皆善於賈，而中華大地物阜民豐，自然吸引昭武九姓諸國來華貿遷有無，自漢以來未曾間斷，至北魏（拓跋魏、元魏或後魏）幾達於頂點，據文獻所載北魏在帝都洛陽城南特設專區以爲來華各國人士居停之所，文獻稱：「…園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自葱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里，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sup>83</sup>北魏時之洛陽城，姑且從寬計有八十萬人，則「附化之民，萬有餘家」。每家姑以五人計，則洛陽有五萬多外國人，以地理位置而言，昭武九姓諸國來華最爲方便，可以想見北魏太和遷都洛陽後，昭武九姓諸國胡人之寓居洛陽者，必然爲數不少。唐都長安（後遷洛陽），其時東來之胡商，雖未必有北魏時之多，但以「天可汗」威名遠播，來華之昭武九姓諸國胡商，在數量上亦必相當可觀，茲據前賢所整理有關史料加以介敘如次：

前已提及，凡康國人來華者，多以康爲氏，而康國人東來之途徑，多經高昌、沙州以及柳城等處，或繼續東來長安，或即在上述諸地定居，以是高昌、沙州，柳城遂成爲康國人主要聚居地，久之，因以籍焉，斯坦因曾得到唐僖宗李僩光啓元年（西元 885 年）寫本《沙州伊州地志》殘卷<sup>84</sup>其中提到頗多康姓人家，而此種康氏又幾皆來自中亞康國。唐太宗貞觀中沙州康國人築有四城，其首康艷典、康拂誕延（或作康拂耽延）其及弟康舍地等，尤爲著稱於世，近人馮承鈞著有「史地叢考」將伯希和之〈沙州都督府圖經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一文中，也提及頗多康氏族人，而來華之康國人也以族出蒲昌貴族爲榮。唐時見諸文獻之康國人除前敘三人外，尚有康薩陀、康昆崙、康枕、康武通、康續、康磨伽、康留買、康庭蘭、康洽、康謙、康老胡雛、康植、康日知、康祿山（即安祿山，本姓康，係

<sup>83</sup> 陽（或作楊）之《洛陽伽藍記》卷三（城南）台北華正書局，1980年，頁160-161，按此書係范銑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台北版或係影印自上海古籍。其中所謂「商胡販客」即是指西域昭武九姓諸國胡商而言，「商胡」一詞至唐時乃專指九姓胡商而言。

<sup>84</sup>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8。

康國人之裔），康阿義屈達干、康達口等，其中康老胡雛一人，出現於李白（上雲樂）一詩，全詩甚長，摘其要者如次：「金天之西，白日所沒。康老胡雛，生彼月窟。巉巖容儀，戍削風骨。…誰明此胡是仙真。西海栽若本，東冥植扶桑。…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倡，五色師子（同獅子），九苞鳳凰。是老胡鷄犬，鳴舞飛帝鄉。…能胡歌，獻漢酒。…」<sup>85</sup>另康洽唐時也有人詠之以詩，代宗時李端有〈贈康洽〉詩即云：「黃鬚康生酒泉客，平生出入王侯宅。今朝醉臥又明朝，忽憶故鄉頭已白。…邇來七十遂無機，空是咸陽一布衣。」此外李頎也有〈送康洽入京進樂產歌〉，其中有「識子十年何不遇，只愛歡游兩京路，朝吟左氏嬌女篇，夜誦相如美人賦。長安風物舊相宜，子苑葡萄花滿枝……」<sup>86</sup>。：以上此二康氏似皆為精於樂律者，而唐宣宗李忱大中初（西元 847-860 年）樂府有康迺，善操婆羅門（康昆崙也精於此），可見來華康國人頗多以西域音樂見重於世。

安國，此為漢文之稱謂，實際上安國有三，曰東安，其本音應讀若喝桿；曰中安，原音應為捕喝；曰西安，應讀若伐地。至於何以譯讀為安，恕筆者學淺，尚未能找到根據。唐時安國人來華者為數頗多，均以安為姓，姑藏涼州安氏，據林寶（元和姓纂）稱系出安國。唐時安抱玉，安抱真兄弟其先祖安興貴以執李軌有功，拜右武衛大將軍歸國公，入居長安，至安抱玉時賜姓李，其兄弟二人兩《唐書》均有傳<sup>87</sup>；可見漢人李姓中也有部分源自昭武九姓之安國。另有安思順、安延、安神儼、安令節、安萬善、安金藏、李國臣（顯係賜姓）等均見諸兩《唐書》或相關文獻，至於未見諸文獻者，當為數更多，北方漢人中有昭武九姓胡族血胤，實為無可爭辯之史實。

曹國、有東曹、中曹、西曹三國，東曹原讀音為率都沙那或蘇對沙那，蘇都識匿，中曹為劫布咀那，西曹即隋時曹國<sup>88</sup>。唐時來華之知名曹國胡人就文獻可考者有曹保、曹善才、曹剛、曹觸新、曹者素、曹明照等人，多以樂律見長，詩人白居易曾有〈聽曹剛琵琶兼示重蓮〉一詩，全詩

<sup>85</sup> 《全唐詩》李白〈上雲樂〉，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七刷，頁 1687。

<sup>86</sup> 以上兩詩均見《全唐詩》

<sup>87</sup> 舊《唐書》列卷一百三十二，《新唐書》列卷一百三十八。

<sup>88</sup> 其原讀音見《新書書》及《大唐西域記》，至其地望之考證，可參見（西突厥史料）。

四句，茲抄錄如次：

「撥撥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瓏。

誰能截得曹剛手，插向重蓮衣袖中。」<sup>89</sup>

詩中明指「胡啼番語」，可知曹剛（或作曹綱）為昭武九姓諸國人無疑，白氏另有〈代琵琶弟子謝女師曹供奉寄新調弄譜〉一詩（《全唐詩》頁 5154）中之曹供奉，向達氏疑其也曹剛（綱）一族<sup>90</sup>。曹善才更以善操琵琶望重於世，其體質特徵詩人李紳於其〈悲善才詩〉中曾有「紫髯供奉前屈膝，盡彈妙曲當春日」之描述，此紫髯蓋西域胡之特徵，張說之〈蘇摩遮〉中即有「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眼紫髯鬚。」可以為證曹善才之為昭武九姓諸國曹國族裔，應無疑問，樂天之〈琵琶行〉一詩中有「曲罷常叫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此善才當也指曹善才而言。甚至五代十國時南唐後主李煜有樂師曹者素善琵琶，或也為曹善才之族。

石國，或為柘支、柘折、赭時、者舌、來華之石國人皆以石為姓，西晉末諸胡列國時（一般漢文文獻多稱之為五胡十六國，不妥，詳見拙著《五胡史論》之石勒，筆者即認定係石國之族裔。唐時在華之石國胡人見諸載記者如石萬年、石崇俊、石寶山、石演芬、石敬瑭等，而石福慶、石誠直雖在文獻上載明其為回紇人，但向達氏於《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中認為在唐武宗李瀼會昌時（西元 841-846 年）回紇勢力已達中亞，昭武九姓諸胡人降於回紇者必多，因此石福慶，石誠直等極可能也為昭武九姓石國人之後裔。以上諸石自當以石勒與石敬瑭最為知名，前者建後趙，後者建後晉。

米國，原音讀若弭秣賀，據張星烺氏稱在唐以前中國並無米姓之人<sup>91</sup>如林寶之（元和姓纂）中即無米氏，南宋初鄧元（古今姓氏書辨正）始見米氏，該書卷二四：「米，西域米國胡人，入中國者，用以為姓。」<sup>92</sup>是可知唐時在華之米姓應皆為昭武九姓米國之後裔，唐時米姓人氏有米嘉

<sup>89</sup> （全唐詩）頁 5060-5061。

<sup>90</sup>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 27。

<sup>91</sup> 張星烺《中亞交通史料匯編》第三冊，頁 1467。

<sup>92</sup> 此處係轉引自《中西交通史料匯編》頁 1467，原作者稱曾參考日人桑原藏之《隋唐時代來往支那之西域人》

榮、米都知、米遂、米志城，米薩寶等，其中米薩寶從其名即知具為祆教信仰。宋時有大書畫家米芾想來當係昭武九姓米國人之胤。

史國，原讀音為羯霜那、佉沙，其來華者以史為姓，唐時有文獻可查者有史思明、史懷思，另有史大秦者（新唐書）有傳，但稱其為西突厥人，惟西突厥曾統有昭武九姓諸國，史大秦或以此混籍於西突厥<sup>93</sup>。

何國，原讀音為霜你迦，唐時有何潘仁、何妥、何稠、何祿、何摩訶等。

以上為有文獻記載之在華昭武九姓諸國胡人，其未見於文獻更當數百千倍於此，據相關論文統計唐代在安史亂前，長安一地之城市居約有一百萬人，其中約有二萬人為「胡客」<sup>94</sup>約占長安總人口百分之二，其中固然不可能盡為昭武九姓諸國人，但以地緣方便性及昭武九姓諸胡皆善於賈，則在長安二萬胡客之中，昭武九姓諸胡占相當大比例，應屬可信者，可見昭武九姓諸國人與唐之關係甚為融洽。僅長安一地至少有萬餘昭武九姓諸胡人定居，至於河西四鎮想必有更多九姓胡人定居，胡漢民族融合乃在不知不覺中進行。

### 丙、胡物之傳入

舉世從無一個地方可以生產全世界所有之物品（包括動物、植物、礦物以及利用此等物質所創造之各種物品），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也不可能擁有全世界各地之物品，此蓋各地有不同之土壤、氣候，因此有不同之物質，盛唐既曾將昭武九姓諸國納為藩屬，而昭武九姓諸胡天性善於商賈，以是物產交流遂成為必然之趨勢，前賢在此方面已有相當研究，成果也極為豐碩，茲擇其要者敘述如下：

動物類：獅、劫火雀、大尾羊、獵蟲鹿、蛇角、駝鳥、靈貓、獬豸、蜘蛛、月氏牛等，其中獅子一項特具意義，獅子傳來中國後，從兇猛之動物轉而成為神瑞動物，舉凡重要或大型建築，往往以石獅子鎮於入口處，不僅如此獅子經過中國人之傳化成為民間年節喜慶之一種活動，目前「舞

<sup>93</sup> 同註 91，頁 1468

<sup>94</sup> 黃維民《論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及特徵》該文列周偉洲、斤欣主編之《西北大學史學叢刊》三秦出版社，1999 年，頁 206。

獅」已然在中國從南到北包括台灣均極為流行，溯本追源，獅子實來自中亞昭武九姓諸國。至於獬廌，即哈叭狗，今則通稱之為北京狗<sup>95</sup>，唐時稱「康國獬廌」其為康國所產無疑，此種獬廌後在中國繁殖，由於其體型嬌小討喜，始終成為中國仕女之寵物，至今仍有人豢養。

植物類：中亞昭武九姓諸國位處錫爾、阿姆兩河之間（石國除外）其地宜於種植、玄奘於其《大唐西域記》即指其地為「林樹蓊郁，花果滋茂」，康國曾以桃子（有金桃、銀桃）列為向唐朝貢品，郁金香（郁或作鬱）為安國所進者，據文獻所載「葉似麥門冬，九月色開，狀如芙蓉，其紫碧，香聞數十步。華而不實（意為開花而不結果），欲種取根。」<sup>96</sup>而唐代詩人也常以之入詩，如李白「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碗或作碗）。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sup>97</sup>自然唐代詩人以郁金香入詩尚有多人，不必一一列舉。尚有青黛，所謂青黛乃中亞婦女慣常使用之化妝品，東起費爾干那盆地，西至裏海沿岸，在此廣大地區婦女皆用之，類如今日之眼影，據《通典》卷一九三引（經行紀）稱「婦人不飾鉛粉，以青黛塗眼而已」，中國婦女以黛畫眉，起源甚早，但以之塗眼或來自中亞，白居易〈上陽白髮人〉對玄宗開元、天寶間之後宮佳麗，即對青黛有所描述。

礦物類：中亞昭武九姓諸國地下富蘊礦藏，其傳入中國而有文獻可查者有鑰（鋅、銅合成之黃銅）紅藍、黑藍、瑪瑙，其中瑪瑙號稱幸運之石，為西域七寶之一，瑪瑙早在南北朝時已傳入中土，如《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即載有北魏元琛有水晶鉢、瑪瑙盃、琉璃碗<sup>98</sup>，唐時昭武九姓諸國所貢瑪瑙形制均頗壯觀。

織品類：紡織品之紋路往往代表民族之風格，因此不同民族有其不同風格之紡織品，又因各地使用材質不同，有綿、麻、絲、毛等紡織品，中亞昭武九姓諸國聚居地區，農牧兩宜，因此在材質上綿、毛皆有，但以民族不同，因此在紡織品上特具中亞風格，據文獻所載唐時自中亞輸入之紡

<sup>95</sup> 蔡鴻生撰有〈哈叭狗流傳〉一文，列注 38 蔡著書頁 211-220。

<sup>96</sup> 《冊府元龜》卷 970 引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西元 647 年）貢品錄。

<sup>97</sup> 《全唐詩》李白〈客中行〉，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1842。

<sup>98</sup> 陽衡之《洛陽伽藍記》台北華正書局，1980 年，頁 207。

織品有氍毹（音榻登）、越諾、舞筵等，所謂氍毹，為西域著名之毛氈，至今無論狹義、廣義西域（狹意指天山南北，廣義指中亞）仍以地毯聞名於世；而越若為布之一種，此布原係波斯所產，透過昭武九姓諸國傳入中土，至於舞筵乃是鋪設於舞台上之地毯，其形制有長方形、圓形兩種。無論氍毹或舞筵唐代詩人王琦、劉禹錫等均曾以之入詩，《全唐詩》中均能查到，此處不加引錄。

食物類：昭武九姓諸在食物上也與漢地有所不同，《新唐書》卷二二一下〈康國傳〉即稱「生兒以石蜜啖之」置膠於掌，欲長而甘言，持珣若黏云」，而康國為昭武九姓之首，康國有此俗其餘諸國諒也有之，可見石蜜為昭武九姓諸國盛產之物，所謂石蜜係以甘蔗漿加乳及油熬煉，使凝固成塊狀，此謂西極石蜜，其熬煉方法源於印度，之後傳入中亞，昭武九姓諸國固優為之，且視之為吉祥之物，故「生兒以石蜜啖之」，以之入貢甚為合適。葡萄酒、無論廣、狹意之西域，皆盛產葡萄且優於釀製葡萄酒，其色鮮美，其味甘醇，早在漢晉時已傳入中土，唐時既威震中亞，葡萄酒更大量傳入中土，唐人以葡萄酒入詩者不勝枚舉，一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傳唱千古。饌饌，係飯食之一種，也即今之所謂「抓飯」，似早在東漢季世已傳入中國，史稱靈帝（劉弘）好「胡飯」，應即是西域胡（即昭武九姓胡）之飯食，按「抓飯」在廣狹義之西域皆讀若「怕羅夫」，正為畢羅之諧音，以其為食物，故各加食字傍。但也有學者考證認為畢羅係類如今之餡餅<sup>99</sup>，也舉證歷歷，究以何者為是，實有待更進一步之考證，惟本文仍以畢羅即今之抓飯，至於餡餅或燒餅（或曰胡餅、麻餅）也均係胡人之食物，時至今日餡餅或燒餅早已成為北方中國人極普遍之食物，鮮少有人知曉其係來自胡人者，抓飯一望即知其為域外之飯食。

音樂舞蹈類：樂音與舞蹈實為一個民族之情感表達，其表達方式均受民族傳統文化影響，有內斂或豪放，華夏或漢人受儒家思想約束，多以內斂方式表達內心之情感，但昭武九姓諸國則未有此項約束，兼以草原文化開放之影響，其在音樂或舞蹈呈現一片豪放景像，若胡旋舞、胡騰舞足以令人眼花撩亂，關於唐代西域胡人音樂、舞蹈傳入之情況，筆者曾撰有

<sup>99</sup> 蔡鴻生前引書頁 77-78。



（隋唐盛世胡風熾）一文<sup>100</sup>，有較詳細介紹可資參考於此不多作贅述。

以上所舉昭武九姓諸國與唐之關係，乃擇其要者，如欲細述其間關係，必得專書始能詳其所有。按唐朝為國史上最足稱道之朝代，在玄宗開元、天寶之前，國力鼎盛，威震四方，大唐盛世造成朝野無比之信心，對外來之人，事、物均能以自信之態度加以接納，並予以改良，久之，則成中國之人事物，是以大唐文化璀璨炫麗，在國史中綻放光芒，至今仍為史家所稱道。本文所敘述僅根據相關文獻，加以彙整，難稱有何創見，如有不足或失實之處，尚祈各界不吝指正。

（2005 年 10 月 3 日收件，2005 年 11 月 1 日審查通過）

### ◆ 小 啟 ◆

- 一、本協會理事長阿不都拉教授於暑間赴新疆故鄉訪問，已於八月十八日返台，並指示於伊斯蘭齋月過後召開常務理監事會。
- 二、本協會秘書長劉學銑於九月又完成一部專書，名為《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由台北知書房出版，該出版社電話為 23640872。
- 三、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假台北市金山南路寧福樓台開常務理監事會，會後由阿不都拉理事長宴請與會常務理監事。
- 四、上年會員大會時雖通過修改章程增加年費，但由於出席會員未能過半，修改章程乙案，未獲內政部核准；希望明年大會時，各會員踴躍出席。

<sup>100</sup> 該文刊《中國邊政》季第 161 期，中國邊政協會發行，2005 年 3 月出版，頁 55-73。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不要相信敵人的笑臉。（維吾爾族）

喝敵人的蜂蜜，不如喝朋友的開水。（維吾爾族）

與友交心要真心，與敵交往要警惕。（藏族）

敵人來了同拉弓箭，朋友來了同飲茶。（藏族）

蛤蟆再跳，跳不出水塘；壞人再躲，躲不過法網。（蒙古族）

用刀要找到骨節，用法要辨別真假。（蒙古族）

吃糧不吃種，吃種不賣地。（彝族）

人不嫌地瘦，地不嫌人窮。（傣族）

立春雨綿延，下雨四九天。（壯族）

一天到晚總來客，客人也失去了尊貴。（烏孜別克族）

只有趕狗的棍子，沒有趕人的棍子。（景頗族）

不肯給馬餵料，遲早要徒步；不肯慷慨待客，遲早會餓肚。  
（哈薩克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烏蘭夫與四三會議研究

孟繁荔<sup>1</sup>

### 摘 要

烏蘭夫（1906～1988），原名雲澤，<sup>2</sup>蒙古族，綏遠土默特左旗人。1925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最早入黨的一批少數民族人士。烏蘭夫自三〇年代起便積極投入共黨工作，長期在內蒙古地區發展黨組織，抗日戰爭中期更因中共黨員身份暴露被迫轉往延安。戰爭即將結束時，他受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到內蒙古，成為中共在內蒙古工作的領導幹部。烏蘭夫面對日本殖民政權崩解後出現的內蒙古民族運動，先藉由協商、宣傳等方式取得「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的領導權並加以解散。1946 年，更透過「四三會議」的召開，將「東蒙人民自治政府」納入中共控制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組織裡。至此除仍由國民政府控制的西部外，其餘內蒙古地區大半成為中共的勢力範圍。

**關鍵詞：**烏蘭夫、內蒙古民族運動、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四三會議

---

<sup>1</sup>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文化教育組碩士，現為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組研究助理。〈烏蘭夫與四三會議研究〉為作者碩士論文《烏蘭夫在內蒙古現代史中多重角色之研究（1937～1966）》部分內容摘錄，寫作論文期間特別感謝指導教授政治大學藍美華博士的指導。

<sup>2</sup> 烏蘭夫出生於蒙漢雜居的土默特左旗塔布村，他的祖父輩即熟悉漢文化，因此取漢姓為「雲」。雲澤是烏蘭夫的漢名，他在留蘇期間取俄文名謝維奇，回到中國後曾化名雲時雨、陳雲章和烏雲達賴等，1947 年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後才取蒙古名「烏蘭夫」，漢譯為「紅色之子」。本文為求統一，均以他最為人熟知的名字「烏蘭夫」稱呼。

## 一、內蒙古民族運動的發展

隨著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其在內蒙古地區的殖民政權也隨之瓦解。在舊政權癱瘓，新政權尚未建立的情況下，蒙古族各階層群眾都非常關心民族的前途與未來的發展。諸如：蒙古青年革命黨與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等政治勢力，紛紛展開行動，引發一波蒙古民族運動的浪潮。這些運動的主要成員，包括：關心蒙古族發展的青年知識份子、上層人士與原任職於日殖民政權的官員，由於他們背景不同、目標各異，因此更增添內蒙古民族運動的複雜性。

在這波民族運動中，最具實力的就是承襲原日殖民政權的「蒙古青年革命黨」及「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等二組織。它們控制除國統區外的內蒙古大部分地區，在中共勢力尚未統合其勢力的國共內戰初期，其政治訴求即是內蒙古民族運動的發展走向，以下是對這兩個組織的發展情況及政治訴求的整理分析。

### （一）蒙古青年革命黨

秘密成立於日殖民蒙疆政府時期的蒙古青年革命黨，主張聯合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在蘇蒙聯軍進入蘇尼特右旗後，該組織得到聯軍負責人羅布桑與伊萬諾夫的支持，得以公開黨的活動。<sup>3</sup>

#### 1. 提出「內外蒙合併」的訴求

1945年8月16日，「內蒙古人民委員會」在蒙古青年革命黨的運作下於德王府成立，作為日本勢力退出後的臨時權力機構。他們正式向蘇蒙聯軍負責人提出「內外蒙合併」的主張，並要求蘇蒙兩國在政治、軍事、經濟方面給予支持。然而，鑑於此事牽涉甚廣，羅布桑等人建議人民委員會派遣代表團前往烏蘭巴托，與蒙古人民共和國高層領導人商討「合併」的問題。<sup>4</sup>

<sup>3</sup> 蒙古青年革命黨在羅布桑等人的支持下，遷入德王府公開運作。白拉都格其、金海、賽航，《蒙古族民族通史》，第五卷（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2），頁546；郝維民主編，《內蒙古革命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頁455。

<sup>4</sup> 白拉都格其、金海、賽航，《蒙古族民族通史》，第五卷，頁546。

與此同時，內蒙古人民委員會也以蒙古青年革命黨和內蒙古人民委員會的名義，向錫林郭勒盟、察哈爾盟、烏蘭察布盟各旗以及東部盟旗發出通知，決定於蘇尼特右旗召開「內蒙古人民代表大會」，並提出將討論「內外蒙合併」的議題。但是，人民委員會在會議召開前即得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副總理拉木扎布以「不能干涉中國內政」為由，拒絕合併要求的聲明，使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合併的計畫被迫停止。<sup>5</sup>

## 2. 對「內蒙獨立」的討論與實踐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回絕，不僅造成內外蒙合併的希望落空，更促使人民代表大會轉為商討「內蒙古獨立」的問題。同年，更名為「內蒙古各盟旗人民代表大會」的會議於9月9日召開，會中代表們討論通過〈內蒙古獨立宣言〉、《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憲法》等文件，並選出臨時政府主席補英達賴，組成臨時政府。<sup>6</sup>

「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後，再度派遣代表團前往烏蘭巴托，尋求蒙古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當局的承認，並給予經濟和軍事的援助。<sup>7</sup>未料，蒙古人民共和國繼回絕「內外蒙合併」的議題後，再次以「不干涉中國內政」為由，否決臨時政府的要求。對此，蒙古國領導人喬巴山接見代表團時表示：「外蒙因國際關係不能幫助內蒙脫離中國成為獨立國家，目前內蒙應當各黨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各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求得民族解放。」<sup>8</sup>

由於臨時政府無法得到蘇、蒙兩國的支持與協助，尋求內蒙獨立的願望因此受挫，他們只能轉而提出在中國境內實行「高度自治」的訴求。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遂成臨時政府達成該目的的主要協商對象。然而，相較於國民政府對高度自治議題上的反對立場，中共中共模稜兩可的態度似乎更有協商空間，為日後與中共合作埋下伏筆。

<sup>5</sup> 郝維民主編，《內蒙古革命史》，頁455～456。

<sup>6</sup> 白拉都格其、金海、賽航，《蒙古族民族通史》，第五卷，頁547。

<sup>7</sup> 郝維民主編，《內蒙古革命史》，頁457～458；郝維民主編，《內蒙古自治區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頁3。

<sup>8</sup> 白拉都格其、金海、賽航，《蒙古族民族通史》，第五卷，頁548。

## （二）內蒙古人民革命黨

中日戰爭結束後，原處在滿洲國境內的蒙古族革命人士、蒙族上層、知識青年和曾任職殖民政權的官吏，也在蘇蒙聯軍的支持下，展開大規模的蒙古民族運動。

### 1. 提出「內外蒙合併」的訴求

1945 年 8 月 18 日，博彥滿都、哈豐阿等人在蘇蒙聯軍的支持下，於王爺廟組織「內蒙古人民解放委員會」，宣佈成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並以「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東蒙本部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發表〈內蒙古人民解放宣言〉。其內容除主張民族平等、聯合中國革命力量外，還提出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主張。8 月下旬，哈豐阿宣布組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東蒙黨部，廣泛宣傳解放宣言與吸收新黨員，同時組織蒙古族各界群眾，進行支持「內外蒙合併」的簽名運動。<sup>9</sup>

10 月 20 日，由哈豐阿、博彥滿都等組成「東蒙古人民代表團」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國，遞交合併請願書。然而，以喬巴山為首的黨政領導人拒絕了代表團的請求，並提出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領導下，解決內蒙古民族問題的建議。11 月，東蒙代表團應中共東北人民政府的邀請前往瀋陽，要求人民政府對「內外蒙合併」的主張給予理解和支持。對此，中共東北人民政府並未給予正面回應，僅是建議東蒙可盡快與在內蒙古西部工作的烏蘭夫取得聯繫，<sup>10</sup>共同協商下一步的動作。

### 2. 東蒙古自治運動

內蒙古人民解放委員會在內外蒙合併訴求未獲蒙古人民共和國同意的情況下，轉而嘗試推動統一內蒙古各盟旗，進而實現獨立的「東蒙古自治運動」。

1946 年 1 月 16 至 19 日，內蒙古東部 36 個旗的代表參加東蒙古人民代表會議，討論後通過〈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樹立宣言〉，宣告

<sup>9</sup> 白拉都格其、金海、賽航，《蒙古族民族通史》，第五卷，頁 536；郝維民主編，《內蒙古革命史》，頁 458～459；郝維民主編，《內蒙古自治區史》，頁 3。

<sup>10</sup> 白拉都格其、金海、賽航，《蒙古族民族通史》，第五卷，頁 539；郝維民主編，《內蒙古革命史》，頁 459。

實行高度自治的「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正式成立。<sup>11</sup>

東蒙政府成立後，由於組成複雜，所持立場不同，導致主張與國民政府、中共中央密切聯繫、或堅持獨立等政治訴求的衝突日益激烈。<sup>12</sup>1946年2月，東蒙政府與國民政府交涉受挫，<sup>13</sup>4月東蒙代表團會面東北民主聯軍，獲得中國共產黨與東北民主聯軍承諾將支持並幫助蒙古人民爭取民族解放鬥爭的承諾。<sup>14</sup>相較於國民政府拒絕高度自治的態度，中共的友善回應成功吸引東蒙政府靠近，為中共對東蒙政府的工作提供有利的條件。

整體而言，中日戰爭結束後興起、以上述兩組織為代表的內蒙古民族運動，均依循著（圖一）的模式進行。最初，各地的領導階層在運動開始時，都希望能脫離中國政權的統治，從內外蒙合併到尋求獨立，建立一個以蒙古民族為主體的政治組織，作為內蒙古民族運動的中心訴求。然而，在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未給予支持的情況下，合併與獨立的計畫無法實現，這使當地的政治領袖轉而與國民政府或中共建立聯繫，尋求他們對內蒙古獨立自治的支持。這使得內蒙古民族運動回歸中國內政的範疇，成為國共對抗下雙方爭取的對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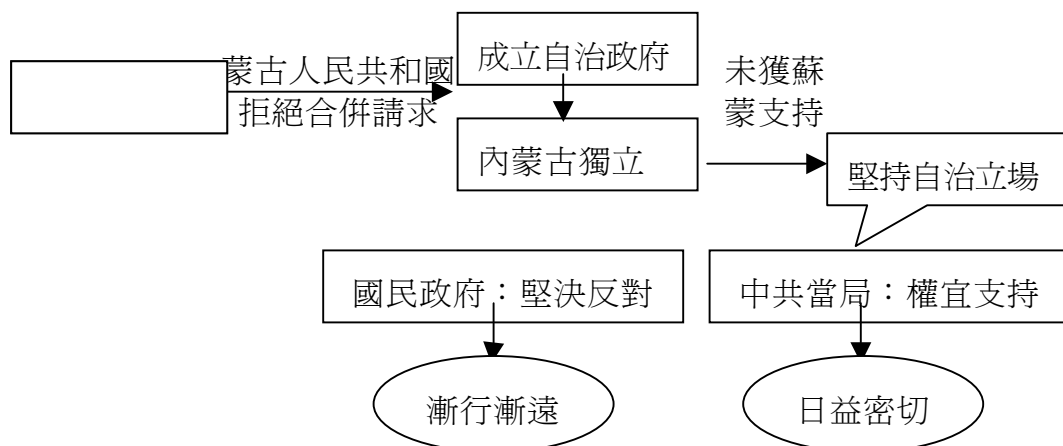
<sup>11</sup> 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範圍包括：哲里木、昭烏達、卓索圖三盟，呼倫貝爾、布特哈二部及伊克明安、齊齊哈爾、蘇魯克三旗。白拉都格其、金海、賽航，《蒙古族民族通史》，第五卷，頁541。

<sup>12</sup> 郝維民主編，《內蒙古革命史》，頁461～462。

<sup>13</sup> 1946年2月11日，東蒙人民自治政府派出代表團，要求國民政府承認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國民黨在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在談話中拒絕承認東蒙政府及其所派出的代表團身份，並以「恐貽國際口實」為由阻止代表團前往重慶。白拉都格其、金海、賽航，《蒙古族民族通史》，第五卷，頁543。

<sup>14</sup> 白拉都格其、金海、賽航，《蒙古族民族通史》，第五卷，頁544。

圖一：國共內戰前期內蒙古民族運動發展模式示意圖



參考資料：筆者綜合資料繪製而成。

## 二、中共對內蒙民族運動的政策

其實，早在中日戰爭進入後期、國共的對抗逐漸浮上抬面時，獲得蘇蒙聯軍協助的中共，就已積極拓展控制範圍。抗戰勝利後，中共進一步確立在內蒙古地區的中心任務為：團結各族各階層人民，建立廣泛的反蔣統一戰線，實現內蒙古的區域自治。<sup>15</sup>為完成此任務，中央便派遣以烏蘭夫為首的民族幹部進入情勢複雜的內蒙古地區，參與、進而主導當地的民族運動。

為達成上述任務，中共對內蒙古地區的工作，主要是以統一戰線為基礎的政策，針對各階層蒙族人士，採取打擊主要敵人（包括：國民政府、投向國民政府的蒙古上層人士等）、拉攏親近政權和蒙族群眾的策略。其方式及預期成果詳如表一。

<sup>15</sup> 《蒙古族簡史》編寫組，《蒙古族簡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頁141。



表一：中共對內蒙工作的方式及預期成果

對象	方式	預期成果
蒙古族各階層人士	調查國民黨過去統治內蒙的情況，揭露其在歷史上統治的罪行。	消除蒙人對國民黨的幻想。
	不侵犯蒙民各階層利益，同時設法給蒙民各種好處。	增加蒙民對中共的好感與支持。
投向國民政府的蒙古族上層人士	對德王、李守信等採取打擊、分化、孤立的政策，爭取反德王、不與德王合作的的上層人士，縮小其打擊面。	一方面將可聯合的蒙族上層最大化，同時減少投向國民政府人士的影響力。
當地蒙民	要求共軍保持良好紀律、尊重蒙人風俗習慣，勿觸犯蒙人禁忌。	建立蒙民對共軍的良好印象，有助於穩定當地統治。

參考資料：

1. 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彙編 1921～1949》（北京：中共中央黨校，1991），頁 964～965。
2. 白拉都格其、金海、賽航，《蒙古族民族通史》，第五卷，頁 531～533。
3. 郝維民主編，《內蒙古革命史》，頁 474～475。

整體而言，中共在對內蒙古的工作則是採取方針由中央決定，運作交由各地方組織的模式，形成中央統一領導，各地方局分區負責的架構。<sup>16</sup> 這樣的分層負責方式對中共中央的工作而言，不僅可減少民族幹部層層請示、曠日耗時的行政作業，亦給予當地的領導幹部烏蘭夫較大的彈性空間，以便隨時針對現況，靈活調整作法。

### 三、中共對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工作

1945 年初，中共中央決定組成綏蒙區黨委、綏蒙政府與綏蒙軍區，並任命烏蘭夫為綏蒙政府主席。<sup>17</sup> 在分層負責的架構下，烏蘭夫即成為中共在內蒙古工作的主要負責人。10 月上旬，烏蘭夫率奎璧等人前往蘇尼

<sup>16</sup> 地方組織分工如下：中共中央西北局負責伊克昭盟和阿拉善、額濟納兩旗的工作；中共中央東北局、西滿分局負責呼倫貝爾地區和興安盟、哲里木盟的工作；晉察冀中央局和晉綏分局、冀熱遼分局領導開闢烏蘭察布盟、察哈爾盟、錫林郭勒盟、卓索圖盟、烏昭達盟的工作。郝維民主編，《內蒙古革命史》，頁 475。

<sup>17</sup> 白拉都格其、金海、賽航，《蒙古族民族通史》，第五卷，頁 530～531。

特右旗德王府，與「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進行接觸，並藉機宣傳中共以民族區域自治解決內蒙古民族問題的政策。<sup>18</sup>

烏蘭夫對臨時政府成員的工作主要可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是說服其放棄合併、獨立的主張；第二步，則為藉由改選取得臨時政府的控制權。

首先，烏蘭夫在對臨時政府人員進行會談時指出，「內外蒙合併」、「內蒙古獨立」的要求是不現實的，不僅當前國際形勢不允許，對蒙古民族的解放也是不利。對於擔任臨時政府主席的補英達賴等原蒙疆政府高級官吏，烏蘭夫則提到，他們是中共八路軍通緝的戰犯，認為他並不適任臨時政府主席一職，應進行改選。<sup>19</sup>此外，烏蘭夫還向群眾，特別是向蒙古族青年說明，內蒙古民族只有堅持馬列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民族解放的論點。<sup>20</sup>由於烏蘭夫長期在內蒙工作累積的經驗，以及本身蒙古族的身份，使其言論切合內蒙古現實情況，成功爭取多數蒙古族青年知識份子與上層人士的支持。

其次，經過烏蘭夫及其成員的遊說，1945年10月下旬進行的臨時政府成員改選，隨即發生徹底的變化。政府主席補英達賴被迫去職，烏蘭夫當選主席兼軍事部長，奎璧任內政部長，<sup>21</sup>以烏蘭夫為首的中共黨員，取得改組後臨時政府的主導權。

再者，烏蘭夫以臨時政府所在地德王府交通不便為由，建議將臨時政府機構遷往張北。11月，陸續移往張北縣的臨時政府，停止以政府名義頒佈公告或與各盟旗的聯絡，至此，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已告解體。

#### 四、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的成立與運作

取得「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的主導權後，烏蘭夫一方面將臨時政府的組織解散，另一方面則在此基礎上積極籌備「內蒙古自治運動聯

<sup>18</sup> 郝維民主編，《內蒙古革命史》，頁475～476。

<sup>19</sup> 白拉都格其、金海、賽航，《蒙古族民族通史》，第五卷，頁549～550。

<sup>20</sup> 內蒙古烏蘭夫研究會編，《烏蘭夫研究論文集》（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頁189。

<sup>21</sup> 白拉都格其、金海、賽航，《蒙古族民族通史》，第五卷，頁550。

合會」（以下簡稱蒙聯會）的成立。在烏蘭夫的計畫中，蒙聯會是適應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與內蒙古廣大人民的要求而籌建的組織，同時也是代表廣大群眾利益和統一領導群眾運動的政治機構。此外，蒙聯會目前的主要任務是發動並組織內蒙古各階層的人民，參加自治運動，其最終目的則是徹底實現全內蒙古的自治，建立一個包括各階層的民主的統一地方政權。

<sup>22</sup>蒙聯會的成立時程詳如表二。

表二：「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成立時程表

時間	事件
1945.11.06	在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的直接領導下，於張家口成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由烏蘭夫擔任籌備會主席。
1945.11.08 1945.11.09	晉察冀中央局兩次致電中央，根據烏蘭夫的意見，建議中央同意成立帶有「政府諮詢機關性質」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
1945.11.10	中共中央復電晉察冀中央局：「關於內蒙工作，同意你們先成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宣布綱領，發動廣大蒙民，準備將來建立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方針。」接獲中央同意的電文後，烏蘭夫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指示精神，起草〈中共中央晉察冀中央局目前對內蒙古政策的幾個要點〉，著手組織蒙聯會的工作。
1945.11.26	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的成立大會在張家口召開，伊克昭、烏蘭察布、巴彥塔拉、錫林郭勒、察哈爾、昭烏達、哲里木等八盟、三十六旗均派遣代表出席會議。烏蘭夫代表大會主席團致開幕詞時指出：「今天內蒙古民族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贊助下，才能求得徹底解放。」應邀參加的中共地方組織官員亦強調，內蒙古民族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的重要性。
1945.11.27	烏蘭夫向大會作〈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目前工作方針的意見案〉報告，明確指出蒙聯會是內蒙古民族徹底解放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是發動蒙古群眾運動的最高統一領導機關。
1945.11.28	全體代表進行蒙聯會執行委員會委員的選舉，共計有烏蘭夫、奎璧等 21 名來自內蒙古各盟旗的各階層人士當選。烏蘭夫代表新選出的執委會致閉幕詞時強調，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領導下，必能達成「解放內蒙古」的目標。
1945.11.29	蒙聯會向全國發表〈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成立大會公報〉，再次指出：「內蒙古人民徹底解放，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

<sup>22</sup> 烏蘭夫，《烏蘭夫文選》，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 2。

參考資料：

1. 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彙編 1921～1949》，頁 974～976。
2. 內蒙古烏蘭夫研究會編，《烏蘭夫研究論文集》，頁 190～191。
3. 郝維民主編，《內蒙古革命史》，頁 479～485。
4. 烏蘭夫，《烏蘭夫文選》，上冊，頁 5。

觀察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成立的過程便會發現，該組織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自治運動機構，同時也是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前的過渡組織。對於中共而言，蒙聯會是以民族區域自治解決內蒙古民族問題實踐的重大步驟。<sup>23</sup>整體而言，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從領導人、組織架構乃至實際運作，均受到中共的協助與指揮。蒙聯會成立後的數月間，該機構的功能，特別在自治運動的推行上，獲得相當程度地發揮。作為一個過渡性的組織，蒙聯會已達成其被賦予的任務。

## 五、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對東蒙人民自治政府的工作

面對蒙聯會於 1945 年底成立，以博彥滿都為首的「內蒙古人民解放委員會」即於同年 12 月初，派遣代表與該組織接洽，表示對共同研擬東西蒙政治走向的意願。蒙聯會的領導人烏蘭夫認為這雖不能立即判斷東蒙當局的形勢，但已表明其對東西蒙聯合的願望。<sup>24</sup>因此，以烏蘭夫為首的蒙聯會，為深入瞭解其態度，亦開始派員進入東蒙，深入調查當地情勢。

然而，原本雙方友善的互動在 1946 年 1 月東蒙宣佈成立「人民自治政府」後發生變化。中共中央認為：「（東蒙）成立這種自治共和國式的政府仍然是過左的。」<sup>25</sup>對此舉不表贊成。然而，儘管如此，中共在爭取中間勢力，以孤立國民政府的考量下，<sup>26</sup>仍指示蒙聯會將東蒙視為其亟欲

<sup>23</sup> 郝維民主編，《內蒙古革命史》，頁 485。

<sup>24</sup> 郝玉峰，《烏蘭夫傳》（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頁 396～397。

<sup>25</sup> 全文名為〈中共中央關於不宜成立東蒙人民自治政府給東北局的指示〉，發表於 1946 年 2 月 24 日。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彙編 1921～1949》，頁 1011。

<sup>26</sup> 例如：1946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發出〈對東蒙問題的指示〉中提到：「對東蒙自治政府政策應慎重，並要相機說服他們接受區域自治，但仍應以團結為主，不要操之過急促他們離開，使他們趨向國民黨。」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彙編 1921～1949》，頁 1023。

聯合的對象。

在中共中央合作的原則下，烏蘭夫獲得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的同意，立即組成「東蒙工作團」，赴王爺廟與東蒙領導人商談合作的問題。<sup>27</sup>東蒙工作團會見人民自治政府主席博彥滿都與重組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負責人哈豐阿時，傳達蒙聯會促成東西蒙統一的意願。由於博彥滿都等人對內蒙古統一與自治問題態度積極，雙方因此決定就此議題進行詳談，<sup>28</sup>為以「統一」為主題的「四三會議」揭開序幕。

## 六、 四三會議

經過先前的接觸與初步共識，以博彥滿都及烏蘭夫為首的東蒙人民自治政府與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代表於 1946 年 3 月 30 至 4 月 2 日在承德召開多次「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籌備會。雙方對於統一後的領導權、政治走向等問題進行反覆的磋商，兩方代表的共識、歧見及結論見表三。

表三：東、西蒙雙方代表於籌備會的共識、歧見及結論

	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代表	由蒙聯會組成的代表團
共識	內蒙古自治運動的統一是內蒙古人民的普遍願望，應盡快實現。	
歧見	與會代表雖贊同自治運動的統一，但不願接受中共的幫助和領導，但不願放棄最終實行內蒙古「獨立自治」的目標。因此提出自治運動統一於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由內人黨領導的主張。 <sup>29</sup>	烏蘭夫堅決反對「獨立自治」的主張，認為此舉將使自治運動陷入孤立而導致失敗。他提出自治運動在必須全面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平等自治」的原則下實行區域自治政策。
結論	東蒙政府代表接受烏蘭夫的論點，雙方在自治運動前途、行政制度、人事安排上取得基本共識，同時決定由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統一領導東、西部自治運動的各項工作。	

參考資料：

1. 白拉都格其、金海、賽航，《蒙古族民族通史》，第五卷，頁 586～587。

<sup>27</sup> 工作團是由蒙聯會常務委員會秘書長劉春擔任團長，代表聯合會和烏蘭夫主席。白拉都格其、金海、賽航，《蒙古族民族通史》，第五卷，頁 582。

<sup>28</sup> 郝維民主編，《內蒙古革命史》，頁 494～495。

<sup>29</sup> 東蒙政府代表堅持由「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的理由是：內蒙古地區落後，沒有產業工人，不宜成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應成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接受中央領導。郝玉峰，《烏蘭夫傳》，頁 404。

2. 郝玉峰，《烏蘭夫傳》，頁 401～411。
3. 郝維民主編，《內蒙古革命史》，頁 499～500。

籌備會召開期間，以烏蘭夫爲首的代表團順利透過與東蒙政府協商的過程，成功取得在合併過程中的主導權。分析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筆者認爲，除烏蘭夫一再申明蒙聯會支持中共領導、強調馬列民族理論的政治理念爲博彥滿都等人接受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他以中共爲後盾的談判實力。因爲相較於中共與蒙聯會的從屬關係，東蒙政府未取得蘇蒙等國際勢力或國民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政治實力顯得薄弱許多，這是使他們只能被動地接受烏蘭夫的建議，同意由蒙聯會主導合併工作的重要因素。

由於籌備會順利取得共識，使烏蘭夫、博彥滿都等雙方代表於得以於 1946 年 4 月 3 日在承德召開「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即著名的「四三會議」。全體與會代表經表決一致通過〈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主要決議〉，內容明確指出：內蒙古自治運動的方針是平等自治，不是獨立自治，並且只有在中共領導幫助下才能得到解放。在領導權方面，宣布以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爲統一領導機關，東蒙自治政府自行解散，其職能由蒙聯會東蒙總分會接替。在人事職務方面，烏蘭夫爲執委會兼常委會主席、軍事部長，博彥滿都爲副主席。<sup>30</sup>

會後，博彥滿都等東蒙代表致電滯留北平的代表，要求撤回代表團，立刻停止與國民政府的接觸。<sup>31</sup>「四三會議」的成功，爲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奠定基礎，<sup>32</sup>對內蒙古日後的政治走向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至此，東西蒙的自治運動統一在由烏蘭夫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中，博彥滿都等東蒙政治人物與國民政府的嘗試接觸與互動關係也劃下句點。

## 七、四三會議對內蒙古政治的影響

「四三會議」不僅結束除國統區外內蒙古地區政治上的長期分治，更宣示東蒙當局與國民政府斷絕聯繫，接受中共領導的政治選擇，爲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提供有利條件。因此，會議結束後，烏蘭夫立即於 4 月 5

---

<sup>30</sup> 郝玉峰，《烏蘭夫傳》，頁 413～414、416。

<sup>31</sup> 白拉都格其、金海、賽航，《蒙古族民族通史》，第五卷，頁 593。

<sup>32</sup> 內蒙古烏蘭夫研究會編，《烏蘭夫研究論文集》，頁 195。

日向中共中央等相關單位發出〈關於承德會議主要決議的報告〉，簡述決議的主要內容及日後工作的方針。他指出，此次會議使東蒙代表瞭解內蒙古民族運動是中國革命的一部份，自願接受中共中央的領導。烏蘭夫同時認為，目前已具備在內蒙古開展工作的良好條件，請中央考慮設立統一的黨委或工作機關的問題。<sup>33</sup>

身兼中共民族領導幹部與蒙聯會主席的烏蘭夫，在東西蒙達成協議後，更成為內蒙古自治運動的領導人。面對建立自治機構與統合區內群眾的重要任務，烏蘭夫總結 1945～1946 年初的經驗，提出今後的工作方針。其內容主要為以下四點：一、徹底貫徹黨的政策，解決民族問題，建立軍隊；二、發動群眾，進行必要的民主改革，加強各地工作的領導；三、放手工作，大批調配幹部，擴大並鞏固已得的勝利；四、進行必要的文化設施建設。<sup>34</sup>這顯示烏蘭夫透過「四三會議」成功整合國民政府統治區外的東西蒙政權後，積極展開軍事鞏固與政治、文化建設等工作，以便為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建立自治區作準備。

## 八、結論

面對抗日戰爭剛結束、各種政治勢力紛呈的內蒙古，烏蘭夫依循中共中央統一戰線的原則，展開與內蒙古民族運動兩股主要勢力的接觸。首先，他以中共為後盾，並運用長期在當地工作的經驗，藉由說服與宣傳的方式，爭取大部分民族運動成員的認同。其次，在組織蒙聯會後，烏蘭夫直接組團前往東蒙政府所在地與博彥滿都等東蒙領導人談判，成為促使「四三會議」召開的關鍵點。由於烏蘭夫在與東蒙代表籌備會時的策略得宜，使其在各個議題上取得主導權，讓「四三會議」能在雙方取得基本共事的前提下，同意由中共支持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在統一後的內蒙古地區居於領導地位。

整體而言，「四三會議」的重要性，不僅是中共在內蒙古地區的政治版圖擴張，更在於結束內蒙古行政權力長期分裂的情況，將國統區以外的地方，統一納入蒙聯會的領導。因此，在國共雙方爭取內蒙古控制權的內

<sup>33</sup> 烏蘭夫，《烏蘭夫文選》，上冊，頁 12～13。

<sup>34</sup> 烏蘭夫，《烏蘭夫文選》，上冊，頁 24。

戰前期，烏蘭夫及其所促成的「四三會議」對內蒙古政治的發展產生「向中共靠攏」的決定性影響。

（2005 年 11 月 5 日收件，11 月 10 日審查通過）



## 大陸內地開辦的西藏中學和西藏班概述

周潤年

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副院長

### 一、開辦西藏中學和西藏班的過程

1984 年初，《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要求充分認識西藏教育的特殊性，對西藏進行“再認識”，一切工作從西藏的實際出發。會議認為，要發展西藏教育，加速培養西藏人才，單純以西藏的力量和內地派人進藏就地辦教育還是很不夠的，必須打破封閉狀態，實行立足本地力量輔以內地支援的多渠道辦學的方式。經國家計委、國家教育部、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研究，並與有關省、市共同協商，決定在上海、天津、遼寧、河北、河南、山東、江蘇、陝西、湖北、重慶、安徽、山西、湖南、浙江、江西、雲南等十六省、市中等以上城市舉辦西藏初中班，在北京、蘭州（或西安）和成都籌建三所西藏學校。1984 年 11 月全國計劃會議期間，向各省、市傳達部署了創建西藏學校和舉辦西藏班培養人才的任務。決定 1985 年首批招生 1300 名西藏小學應屆畢業生，分別按對口支援的形式安排。

招生原則：（1）完全自願；（2）只招收藏族學生；（3）要德、智、體合格，能堅持長期學習。

招生名額：上海市 100 名；天津市 100 名；遼寧省 100 名；河北省 100 名；河南省 100 名；山東省 100 名；江蘇省 100 名；陝西省 100 名；湖北省 100 名；重慶市 100 名；安徽省 50 名；山西省 50 名；湖南省 50 名；浙江省 50 名；江西省 50 名；雲南省 50 名。

學制：學制為四年，補習小學文化一年，初中三年。初中畢業後大部分升入當地中專或技校，少數成績優秀的學生分別轉到北京、蘭州、成都

三所西藏學校入高中學習三年，高中畢業後擇優升入大學本專科學習。

教學用語：西藏班以漢語文教學為主，也可以視情況加授藏語文和英語。

師資：辦西藏班的學校，要充分挖掘潛力，利用本校的師資力量和設備。藏語文教師要由西藏選派，每校派 5 人（其中教師 3 人，行政管理人員 2 人），共 130 人。實行定期輪換，其任務除進行藏語文教學外，還要管理學生生活，進行思想工作，同時還可進修提高業務水平。

1985 年秋，西藏教委通過對應屆小學畢業生的考核，1300 名學生被選送到內地十六省、市學習深造。其中拉薩市 500 名，送往上海、重慶、陝西省、江西省、浙江省、安徽省、湖南省；日喀則地區 250 名，送往山東省、河南省、雲南省；昌都地區 200 名，送往河北省、湖北省；山南地區 200 名，送往遼寧省、江蘇省；那曲地區 100 名，送往天津市；阿裏地區 50 名，送往山西省。

1986 年 5 月 16 日至 19 日，國家教委在湖南省岳陽市召開了十六省市西藏工作會議。會議著重研究了以下一些問題：1、1986 年西藏班的招生辦法；2、1985 年所招學生升入初中的問題；3、清退不合格學生的辦法。會議經過充分討論，解決了開辦西藏班一年來的一些實際問題。

1987 年 9 月，中央領導在全面考察了西藏之後，爲了適應西藏經濟建設的需要，針對西藏教育落後、人才匱乏的狀況，國務院在北京專門召開了以教育爲主要內容的第二次援藏工作會議，明確了發展西藏教育的指導思想及有關政策措施，特別對內地辦學這一具有戰略意義的決策給予充分的肯定。此年，北京、成都、蘭州三所西藏中學開始招生，每所中學計劃每年招收數百名初中畢業生，這些學生全部是西藏的少數民族。

1989 年，又在內地舉辦西藏高中班（校）以及各類中專班。首屆內地西藏班初中生畢業，進入中等技術專業學校 862 人，300 名學生進入高中進行學習。從 1992 年起，每年不僅有近千名藏族中等專業技術人才回到西藏參加四化建設，而且還會有一大批藏族高中畢業生考入大學深造。

1993 年 3 月，國家教委受國務院委托在北京召開了教育支援西藏工作會議。會議明確提出今後內地辦學的方向是“長期堅持，努力搞好，逐步擴大的方針，實行對口、定點、包乾責任制”。此次會議，就對口單位

對教育援藏的任務、形式、經費、責任、義務等進行研究，簽訂了協定。使內地辦學又步入了一個新的臺階。

1994 年 7 月，國務院又召開了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會議根據西藏教育的實際，總結了內地十年辦學的經驗，並提出了“長期堅持，逐步擴大，不斷完善”的長遠發展方針。

到 2000 年，內地辦學累計初中招生 2.27 萬人，高中招生 4800 餘人，中師招生 3000 餘人，中專招生 6500 餘人，職高招生 80 人，大學招生 2800 餘人。“九五”期間，內地辦學規模進一步擴大，初中年招生 2000 人，高中年招生 1000 人，內地辦學高中已增至 9 所，擴大了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比例。

到 2005 年，全國已有初中校 21 所、高中班（校）9 所、中等師範校 2 所以及各類中專班遍及全國 28 個省（市、區）。已有 13760 餘名各類中專中師畢業生、2680 余名大學生返回西藏參加建設事業。內地西藏班（校）為西藏經濟建設輸送了一批比較合格的中、高級人才，對西藏教育起到重要的補充和促進作用。

近二十年來，中央和內地省市已為西藏班（校）投了大量資金，並且建立了一支素質較高能夠從事西藏班（校）教學和管理的基本隊伍，涌現了一批德才兼備的先進教育工作者和品學兼優的學生。同時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教改探索，積累了一些寶貴的教學和管理經驗。實踐證明，內地辦學不僅是發展西藏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是培養西藏人才的一條重要途徑，它具有以下幾點好處：

第一、可加強各民族的團結，使少數民族學生從小樹立中華各民族團結起來共同建設祖國的觀念。

我國是一個由多民族共同締造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搞好民族團結的教育，對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關係，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但是，如何對少數民族學生進行愛國主義的民族團結教育，在方式和方法上是值得考慮的。如在當地進行民族團結的教育，當然可以提高青少年一代的政治思想覺悟。可是從歷史的經驗來看，讓少數民族的學生到內地與漢族的學生一塊學習和生活，其效果更佳。近二十年來，西藏選送的學生一踏上內地的土地即受到各族人民的熱烈歡

迎，學校的領導和老師們不僅全心全意地為藏族同胞培養合格的人才，而且在學、住、吃、穿等方面象對待自己的親生兒女一樣關心和照顧少數民族的學生。許多漢族學生及其它少數民族學生同藏族學生成了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的好朋友。內地人民的深情厚意，學校領導和老師的辛勤勞動，學生們將銘刻在心中。同時，這種內地辦西藏中學和西藏班的辦學方式在廣大的學生家長以及藏族人民心中也必將產生日益深遠的積極影響，它為內地和西藏之間的相互瞭解，開闢了廣闊的途徑，對於維護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對於西藏的發展都具有深遠的重大意義。

### 第二、可開發藏族學生的智力，使他們的學習成績不斷得到提高。

在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內地教育以一日千里的速度迅猛向前發展。在內地已成為歷史的東西，而在西藏的邊遠地區，却還聞所未聞。今天內地大部分中小學已經使用上了先進的電化教學設備，而西藏的部分學校且不說電化教學設備，就是能做到桌椅板凳不缺，有間教室，有位老師能把書本上的知識傳授給學生就算不錯了。現在西藏邊遠地區的個別小學因沒有教室，只好在簡陋的房屋或倉庫中上課；因沒有課桌、板凳，學生上課只好就地而坐，用一塊小木板當作課桌。這種教學條件，怎么能培養出高水準的學生呢？藏族學生的智力與其他民族學生的智力是沒有差別的，藏族學生的學習之所以差，主要是因為社會環境以及學校條件差而影響了他們的智力發展。十多年來，內地各省市皆為西藏班配備了得力的領導和最優秀的教師，各學校充分利用電腦、電影、電視、幻燈、圖片等先進的教學設備，進行了形象化的教學。此外，還組織學生到先進的工廠、農村和科研機構參觀訪問，親眼目睹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碩成果。從而開發了藏族學生的智力，使他們的學習成績有了顯著的提高，個別優秀學生的學習成績已超過了當地的學生。濟南十四中的兩個初一西藏班期中考試成績，在同校同級的 8 個班中，藏二班名列第一。全校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的 57 名同學中，兩個西藏班的學生占 34 名。1992 年——2001 年，參加全國普通高校招生考試，內地西藏班學生比區內學生平均成績高出 100 分（不含藏語文成績）；內地西藏班學生（初中畢業生）返藏參加統考，他們的平均成績高出區內學生 150 分左右。

### 第三、可以緩解西藏師資嚴重缺乏的矛盾。

由于西藏海拔高，高寒缺氧，生活又艱苦，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進藏的一批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大多數已退休返回內地。七十年代援藏的教師，而今已年過半百。他們中有的多病，有的因氣候等原因，不適宜在西藏工作而早已調回內地，也有的由于其他原因，離開了西藏。據不完全統計，自 1978 年以來，約有 4000 多名大、中、小學教師內調或外流，如此造成了西藏師資嚴重短缺。筆者于 1990 年，在西藏調查的 20 多個地、市、縣中，沒有一個縣或一所學校不喊短缺教師的。康馬縣中學每位教師要擔任三、四門課，課時多的教師一周達 20 多個。米林縣中學 16 位教師中，就有 9 位是從社會上招聘的代課教師。江孜全縣歷史、地理、音樂、美術教師一位元也沒有，生物教師只有一位，漢語教師極缺，許多課程不能正常開設，常常是明天就要開課了，今天還未找到任課教師。在教師這樣短缺的情況下，每年選送一大批藏族學生到內地學習，可以大大緩解西藏師資嚴重缺乏的矛盾。

#### 第四、可節省一大筆教育經費，用以改善目前西藏的辦學條件。

西藏地域遼闊，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自然地理環境艱苦，辦教育的難度大。西藏地處青藏高原，面積 120 多萬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4000 米左右，高寒缺氧，素有世界屋脊之稱。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統計，全區總人口 219.6 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1.6 人，是全國人口密度最小的省區。全自治區分為六個地區和一個市，共有 75 個縣（含四個縣級區、口岸、辦事處），其中以農業為主的縣 36 個，純牧業或以牧為主的縣 24 個。少數大的縣五、六萬人口，多數縣僅有一、二萬人口，還有一些不足一萬人口的縣。雖然除墨脫縣以外縣縣都通了汽車，但各縣內的交通工具則主要依靠馬匹和牛羊。牧區學生上學騎馬往往要走幾天甚至十幾天的時間，由于缺乏交通工具，學生的生活、學習資料和學校基建材料等運輸很困難，故培養一名學生費用極為昂貴。據統計，西藏培養一名中小學生的費用要比內地同類學生高出 2-----3 倍。內地為西藏辦學可以用較少的投資獲較高效益的辦學效果。這樣可為西藏教育節省一大筆經費，用以改善目前西藏落後的辦學條件。

近二十年來的內地辦學實踐表明，這一辦學形式有利于加速西藏人才培養的步伐，有利于各民族青少年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團結，有利于內地和

西藏的相互瞭解。總之，內地辦學是中央和地方幫助西藏發展教育事業，促進西藏繁榮昌盛的重大戰略措施，長期堅持下去，其重大作用和深遠意義將愈加明顯。

## 二、內地西藏中學和西藏班的簡況

### 北京西藏中學

北京西藏中學位于北京亞運村東側的朝陽區北四環東路高原街1號。1987年5月奠基建校，學校占地3.2萬多平方米，建築面積1.9萬多平方米，包括教學樓、科技樓、辦公室、學生宿舍、教工住宅樓、食堂、健身房、階梯教室、音樂舞蹈室、電視播映室等。在科技樓還設有物理實驗室、生物實驗室、化學實驗室、語音教室、電子電腦房等。每個教室都有彩電等，電化教學設備先進，為北京市重點中學之一。學校有教職工172名，專任教師58名，其中高級教師18名，中級職稱28名。現有預科、初中、高中三個學段，學制七年，初、高中各三年，初中預備班一年。共計14個教學班，學生總數700余人。

### 成都西藏中學

成都西藏中學位于成都市南一環路四段。1988年9月奠基建校，學校征地46畝。學校實用面積1.7萬多平方米，包括教學實驗綜合樓、辦公室、宿舍、食堂、健身房、游泳池、運動場、校開工廠等。學校還建有物理、化學、生物實驗室以及微電腦室、錄音室、圖書室、閱覽室等。學校圖書室藏書一萬餘冊，訂閱雜誌二百餘種，報紙三十多種，教學設備、實驗儀器齊全，是四川省重點一類中學。學校有教職工90人，其中專任教師60人，黨員29人，教職工中具有高級職稱的14人（其中特級教師1人），中級職稱31人，初級職稱18人，教職工中大學本科畢業41人，專科畢業18人。在校學生835人。

### 天津紅光中學

天津紅光中學位于天津市河北區水產前街。此校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與共和國同齡。1985年開始辦初中西藏班，1989年，開始辦高中西藏班。校園占地面積46000平方米，建築面積17000平方米。1986年，

新建教學樓 5000 平方米，包括教室、實驗室、電腦房、語音教室，藏書 39000 冊的圖書館；1990 年，建成 1200 平方米的體育館；1989 年，新建 3100 平方米學生宿舍樓，1992 年，擴建裝修 3500 平方米的醫務室以及供千名學生就餐的食堂和男女浴室、洗衣房、供水、供暖等完備的生活設施。1996 年 3 月，還新建有容納千人的大禮堂和 2600 平方米實驗樓。紅光中學是一所具有先進的教學設備、功能齊全的生活設施、環境幽雅的中學。全校教職工總數 179 人，教師 94 人，其中特級教師 16 人，中級教師 63 人。現有教學班 21 個，在校學生 928 人。

### 重慶藏族中學

重慶藏族中學位于澄清市沙坪壩區歌樂山。此校原名重慶市 31 中，1953 年建立，是一所完全中學，學校占地面積 4.5 萬多平方米。1985 年，開辦西藏班後，學校更名為重慶藏族中學，同時升格為市重點中學。學校撤消了高中建制，設 14 個初中班，其中藏族 8 個班，學生 400 人，學制 4 年；漢族 6 個班，學生 300 人，學制 3 年。是一所漢藏合校的新型民族中學。學校有在編教職工 103 人，其中校級幹部 5 人，中層幹部 6 人，高級教師 6 人，中級教師 30 人。

### 上海市回民中學

上海市回民中學位于上海市瀘太路 1000 號。此校創立于 1945 年。1985 年接受黨中央援藏的任務，開辦了西藏班，每年從西藏招收 100 名藏族小學畢業生。上海市教育局為加強民族教育，已撥款 500 萬元，作為專款經費用于改善辦學條件，占地 57.5 畝的校園建築群、環境優美。學校根據黨的教育方針和培養目標，十多年來積極穩妥地開展了一系列以減輕學生負擔，培養能力，提高教學質量的教改實驗，取得了矚目的成效。學校有教職員工 134 人，專任教師 102 人，其中特級教師 1 人，高級教師 11 人，一級教師 45 人。

### 濟南玉函路中學

濟南玉函路中學位于濟南市玉函路 88 號。此校前身為濟南十四中和濟南回民中學西藏班，于 1991 年 3 月合為一校，即濟南玉函路中學也稱西藏中學。學校占地 30 畝，建有教學實驗樓、多功能樓、學生宿舍樓

等，濟南市將此校定為市重點學校，從師資配備到設備配置都放在優先的地位。自 1985 年起，每年從西藏招生 100 名小學畢業生，現有在校生 410 人。學校有教職員工 61 人。

#### 遼陽市第一中學

遼陽市第一中學是遼寧省的一所重點中學。學校自 1985 年 8 月開辦西藏班以來，曾為西藏學生建有一座宿舍樓和 926 平方米的大食堂。學校還設有圖書室、閱覽室、生物實驗室、物理實驗室、化學實驗室、音樂教室、勞技教室、語音室、微電腦室等，供學生學習和教學使用。學校從 1985 年至 1997 年的 13 年間共計招初中生 1272 人。到 2005 年已累計招收初中生 2220 餘人。

#### 常州西藏民族中學

常州西藏民族中學位于江蘇省常州市常錫路育英橋。此校創建於 1985 年 7 月，是一所為西藏培養人才的江蘇省重點中學。學校占地 45 畝，主要建築有教學綜合大樓、學生宿舍樓、教工宿舍樓、餐廳、浴室等。還建有家長接待室、商店和儲蓄所。學校規模 8 個班級，學制 4 年（預科 1 年，初中 3 年）。在校學生 420 人，漢族教職工 58 人，藏族教師 6 人。

#### 南昌市第十七中學

南昌市第十七中學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上海路 16 號。學校於 1958 年創辦，是一所市屬完全中學。學校占地面積近 60 畝，建有教學大樓、辦公大樓和綜合實驗大樓。實驗大樓內除大型分組實驗室外，還有電化教室、語音室、階梯教室、圖書室、閱覽室等。學校有教職工 163 人，其中高級教師 18 人，一級教師 54 人。現在西藏班在編專職教學及管理人員共 21 人，其中具有高級職稱教師 3 人，中級職稱教師 5 人，具有大學學歷的教師 10 人。學校從 1985 年至 1997 年的 13 年間共計招初中生 681 人。到 2005 年共招收西藏班 21 個，學生共計 1170，現在西藏學生四個年級 8 個班，共計學生 310 人和 4 名西藏籍的老師。

#### 合肥市第六中學

合肥市第六中學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壽春路 234 號。此校創建於 1954



年。學校占地面積 3.5 萬多平方米，主要建築有教學樓、科學樓、辦公樓、綜合樓以及教師宿舍等，科學樓設有微機房、語言室、電影放映廳和物理、化學、生物實驗室等。自 1985 年開辦西藏班以來，學校還為西藏班建有一棟宿舍樓以及含有廚房、餐廳、浴室等設施的生活樓，為藏族學生提供了良好的學習和生活環境。學校在編教職工 168 人，其中一級教師 67 人，在西藏班教學的就有 8 人。學校從 1985 年至 1997 年的 13 年間共計招初中生 605 人。到 2005 年已累計招收初中生 1030 餘人。

#### 湖南省岳陽一中

湖南省岳陽一中位于湖南省岳陽市洞庭湖湖畔。學校于 1949 年創立，與共和國同齡。是湖南省的一所重點中學。學校占地面積 8 萬多平方米，建有教學樓、辦公樓、宿舍樓、理化實驗室、語音室、電腦房、音美勞技專用教室、圖書館、閱覽室以及體育館和田徑場。學校從 1985 年至 1997 年的 13 年間共計招初中生 906 人。到 2005 年已累計招收初中生 1300 余人、高中生 420 余人。

#### 臨潼華清中學

臨潼華清中學位于陝西省臨潼縣驪山腳下的華清池畔，創建于 1939 年，是陝西省的一所重點中學。學校歷史悠久，生活和教學環境優美，素以美麗幽雅而聞名。校園占地面積 8 萬多平方米，建築面積 1.8 萬平方米，建有教學樓、辦公大樓、圖書樓、實驗樓等，實驗樓內設有化學實驗室、物理實驗室、微電腦室和電教室等。為了加快建設西藏，加強民族團結，受國家教委委托，1985 年開辦了西藏初中班。此後，學校為藏族學生建有名為“興蕃樓”、“和同樓”的二座宿舍大樓以及設施先進的廚房和大禮堂等。學校從 1985 年至 1997 年的 13 年間共計招初中生 1070 人。到 2005 年已累計招收初中生 1600 餘人。

#### 鄭州市第四中學

鄭州市第四中學位于河南省鄭州市京廣北路 86 號。學校創立于 1938 年 12 月，學校環境優美，地處火車站繁華區，交通十分便利，是我國建校較早、條件較好的完全中學之一。學校占地 50 畝，建築面積二萬多平方米，有二幢教學樓、三幢辦公樓、五幢教職工宿舍、一幢學生宿舍以及

大禮堂和實驗樓等，實驗樓內有微機房、電教室、實驗室、放映廳等，教學儀器齊全，實驗設備先進。學校從 1985 年至 1997 年的 13 年間共計招初中生 1115 人。到 2005 年，學校共招收了十九屆 1850 名藏族學生，已畢業 1200 餘人，半數的學生升入高中就讀，98% 的學生到高一級學校進行深造，現在已有一大批學生學有成就，返藏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不少人還擔任了重要崗位工作。

#### 沙市第六中學

沙市第六中學位于湖北省沙市市北京中路 139 號。學校創建於 1956 年，是湖北省的一所重點初級中學。學校占地面積 2.8 萬多平方米，主要建築有教學樓、辦公樓、實驗樓、圖書館、階梯教室以及二幢藏族學生宿舍樓等。學校生活環境優美，教學設備良好，為藏族學生學習生活創造了很好的條件。學校從 1985 年至 1997 年的 13 年間共計招初中生 1060 人。到 2005 年已累計招收初中生 1730 余人、高中生 390 余人。

#### 山西大學附屬中學

山西大學附屬中學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場城西街 3 號。其前身是山西省幹部子弟學校，目前是山西省的重點中學之一。學校占地面積 9 萬多平方米，建有二幢教學樓、一幢實驗樓、一幢圖書電教樓、二幢學生宿舍樓、二個學生食堂、三個運動場等。學校環境優美寧靜，各學科實驗實習設備均較完備。學校在編教職工 180 人，其中專任教師 110 人，具有高級職稱的教師 47 人，一級教師 45 人，本科學歷的教師 101 人。學校從 1985 年至 1997 年的 13 年間共計招初中生 879 人。到 2005 年已累計招收初中生 1520 餘人。

#### 河北師範大學附屬民族學院

河北師院附屬民族師範學校位于石家莊市紅旗大街 102 號。此校前身是於 1985 年建立的河北師範學院附中西藏班。1989 年 3 月，經國家教委和河北省政府批准，正式成立了河北師院附屬西藏學校。1993 年 3 月，經河北省政府批准，更名為“河北師院附屬民族師範學校”。1996 年，隨著新的河北師範大學的合併成立，學校隨原河北師院併入河北師範大學，更名為河北師範大學附屬民族師範學校。2000 年，隨著教育援藏工

作的層次提高，學校又開始承擔招收中師畢業生起點的兩年制大專的辦班任務，學校更名為河北師範大學附屬民族學院。學院占地 44 畝多，主要建築有教學樓、實驗樓、辦公大樓、綜合大樓、宿舍大樓、圖書館、音樂美術教室、餐廳等。現有中師三個年級六個班，初中（含預科）四個年級六個班，共計十二個教學班。學校先後為西藏昌都地區培養（對口支援）初中生 1132 人，培養大專生 380 人。共為西藏自治區培養初中、中師、大專生合計 2800 人。

### 紹興市第一中學

紹興市第一中學位于浙江省紹興市勝利路 41 號。此校創建於 1897 年，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是浙江省的一所重點中學。學校擁有一支優秀的師資隊伍，學校有教職工 130 人，其中具有高級職稱的 32 人，中級職稱的 54 人，2 名省特級教師、4 名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學校從 1985 年至 1997 年的 13 年間共計招初中生 605 人。到 2005 年已累計招收初中生 1290 餘人。

此外，福建省於 1997 年在三明市列東中學開辦了西藏班，到 2005 年已累計招收初中生 540 餘人。廣東省於 1995 年在惠州八中、佛山一中、中山中等專業學校開辦西藏班，到 2005 年已累計招收初中生 2100 餘人。從 1989 年開始，黑龍江省衛生學校、營口職業高中、山東省衛生學校、大同電力技工學校、華北廣播電視學校、內蒙古郵電學校、呼和浩特交通學校、河北師範學院藏族學校、合肥師範學校、江蘇句容農業學校、江蘇江寧衛生學校、揚州水利學校、上海行政管理學校、上海交通學校、浙江省警察學校、福建省福州衛校、江西省衛生學校、開封第二師範學校、福建稅務學校、襄樊財稅學校、漯河師範學校、許昌師範學校、沙市財經學校、武漢市農業學校、武漢市司法學校、湖南省林業學校、湖南省建築學校、青海省郵電學校、廣東省對外貿易學校、陝西幹縣師範學校、成都水力發電學校、重慶稅務學校、湖南省建設銀行學校、西安電力學校、重慶民政學校、昆明冶金專科學校、黑龍江省糧食學校、四平市衛生學校、四川統計學校、浙江省銀行學校、黃河水利學校、浙江第二警校、湖南省社會學校、山東省法律學校、四川省銀行學校、武漢電力學校、廣州商業學校、遼寧省印刷出版學校、濟南交通學校、四川廣播電視學校、陝西省郵

電學校、甘肅省郵電學校、貴州省郵電學校、民航上海中專、昆明陸軍學院、西藏大學少年班、泰州畜牧獸醫學校、南京衛校、福建工商行政管理學校、岳陽師範學校、南京氣象學校、湛江氣象學校、南京地質學校、昆明地質學校、蘭州氣象學校、四川郵電學校、湖北省啤酒學校、廣州輕工業學校、河南省郵電學校等六十九所學校，采取合校單班和合校混班的形式招收西藏的初中畢業生。

### 三、開辦西藏中學和西藏班的成就及經驗

#### （一）、開辦西藏中學和西藏班的成就

##### 1、培養了一大批藏族人才。

開辦內地西藏班（校）近二十年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到目前為止，全國已有各類內地西藏初中班（校）及中專西藏班（校）140 多所，遍布全國 28 個省、市、自治區。已累計招收西藏區內以藏族爲主的各少數民族及部分進藏幹部職工子女小學應屆畢業生二十三萬人，這些學生來自西藏七個地市，農牧民子女約占 70%以上。目前有各級各類內地西藏班在校生一萬余人，其中三千餘名各類中專生（含中師）分布在全國六十九所中專學校學習；二千余名大學生分布在內地六十三所高校和西藏區內四所高校學習。所學專業涉及經濟、教育、管理、衛生、郵電、交通、機械、稅務、財經、商業、外貿、建築、地質、農業、林業、輕工、電力、氣象、司法、民政等七十餘個專業。1992 年第一批中專畢業生走上建設西藏的工作崗位，1994 年首批進入高校的大學生，也畢業返藏工作。到目前為止，已有中專畢業生六千余人，中師畢業生八千余人，高校畢業生二千七百餘人。這些學生不少已成爲西藏建設事業的骨幹，受到西藏用人單位及社會的普遍好評。有些畢業生在很短的時間內已成爲鄉村學校的校長、鄉鎮企業的負責人、中層領導幹部、業務技術骨幹。內地西藏班（校）已爲西藏建設事業輸送了一批比較合格的專業人才，他們爲西藏的經濟建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2、藏族學生的學習成績普遍得到提高。

近二十年來，在內地各級各類學校廣大教師的悉心教育、耐心輔導下，藏族學生的學習成績都在原有基礎上有了顯著的提高。從 1992 年連

續三年內地西藏班高中畢業生參加全國普通高考，文、理科人均分數都高出區內考生 100 分以上。1993 年，北京西藏中學的一位農村學生以 456 分的成績達到了北京高等院校的本科錄取綫。1994 年，北京、天津、成都三所西藏中學的 32 名學生的高考成績達到了北京高等院校的大專錄取綫，其中有 3 名學生的分數達到了北京市的重點大學錄取綫。僅 1992 年——2001 年參加全國普通高校招生考試而言，內地西藏班學生比區內學生平均成績高出 100 分（不含藏語文成績）；1999 年——2001 年內地西藏班學生（初中畢業生）返藏參加統考，其平均成績高出區內學生 150 分左右。這些學生到大學後，充滿自信，學習刻苦努力，有的已成為尖子學生。如湖南省岳陽市一中的白瑪多吉同學獲初中奧林匹克化學競賽湖南賽區三等獎；湖北省沙市第六中學的古如多吉同學榮獲全國數學競賽優勝獎。

### 3、形成了一支熱愛西藏教育事業的管理幹部和教師隊伍。

近二十年來，培養了一支熱愛西藏教育工作、無私奉獻的教育管理幹部和教師隊伍。各西藏班（校）的管理幹部，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他們以校為家，不管在春夏秋冬，他們總是第一個起床，最後一個上床，檢查督促學生起床、就寢、自習、訓練。學生違反了紀律，他們與之促膝談心，反復講清道理，想方設法讓他們口服心服。西藏班（校）學生的吃、穿、住、行、醫各方面都離不開管理幹部的辛勤勞動。學生有病，他們自己掏錢購買營養品前去探望；衣服破或髒了，她們主動拿去縫補或洗淨；生活上有了困難，他們總是給予最熱情的關心、照顧、幫助。西藏班的學生年紀都很小，他們既當管理學生的老師，又當生活的“保姆”。嚴格教育中又滲透著一股兄弟般的熱情。

各西藏班（校）的教師為了搞好教學工作，他們除四處收集資料、抓緊時間認真備課外，還通過各種渠道瞭解藏族學生的年齡層次、性格、脾氣、習慣等。由於藏族學生和漢族學生有許多相異之處，所以他們組織實施教學，就得花更多的精力，去摸索比較適合於學生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如他們採用的精講多練、現場繪圖、理論聯繫實際以及集體講授與個別輔導相結合等教學方法，得到了藏族同學們的一致好評。除了組織實施正常的教學工作，各科任課老師還注重教書育人，通過經常與學生接觸談

心，瞭解學習、生活、思想狀況，改進教學方法，配合班、部做學生的思想工作。目前，西藏班（校）已形成了一支素質較高，學歷合格，老中青比例合理，具有較高教學和管理水平的教師隊伍。

#### 4、各地西藏班（校）的辦學條件不斷得到改善。

近二十年來，國家和各省、市、自治區以及各部門，為辦好內地西藏班（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內地辦學經費 1996 年達到 1500 萬元，辦班以來西藏教育事業費列支的內地辦學經費累計達一億餘元，國家財政部對內地西藏班的補貼也從 1986 年的每年 200 萬元增加到 1996 年年的 700 萬元。從 1992 年起，國家每年撥款 400 萬元，作為西藏班學生到內地上學的路費、伙食費、醫療費等經常費用。為使藏族學生健康成長，各省、市和部委不但給學生提供了衣、食、住、行以及學習用品和看病等費用，還減免學生的各種學雜費，並給每個學生補助了生活費，少的每個學生每年 500 餘元，多的達到 1000 餘元。由於國家和各省、市、自治區的教育經費大幅度增加，故各西藏班（校）的辦學條件不斷得到改善。各學校採用了諸多現代化的教學手段，不僅擁有設施較先進的語言實驗室、電腦房和儀器配置較為完善的物理、化學、生物等各類專門實驗室，而且還建有寬敞明亮的教室、整齊舒適的宿舍、功能齊全的生活設施以及環境幽雅的校園。

### （二）、開辦西藏中學和西藏班的經驗

第一、辦好內地西藏教育，必須要依靠全國各族人民的支援。

內地西藏班（校）的基建費、開辦費、經常費等，本著“全國支援西藏”的精神，由承擔任務的有關省、市、自治區財政部門和部委負責解決。近二十年來，除國家在創辦初期的 3000 萬元基建專項經費和 1987 年“二援”會議安排的 1360 萬元補助經費之外，各省市還從地方財政中拿出 5000 多萬元，幫助學校改善辦學條件。各省市為學生提供了優越的學習、生活條件，學生入學後的衣、食、住、行、用、看病等項費用實行了專項補助。例如陝西省人民政府決定，從 1988 年開始，每年撥給臨潼華清中學 40 萬元專項經費，作為 400 名西藏學生的補助費，平均每個學生達 1000 元；天津市人民政府做出決定，今後紅光中學西藏班經費不足部分，由市政府按西藏班學生人頭進行定額補助，老生每年補助 400 元，新

生每年補助 500 元。近幾年有關省市的財政雖然都比較緊張，但對西藏班（校）所需經費都給予了充分照顧。

第二、辦好內地西藏教育，必須要從西藏學生的實際和特點出發。

從西藏學生的實際出發，精心組織教學，嚴格要求，嚴格管理，是不斷提高辦好內地西藏教育質量的可靠保證。內地各學校從西藏學生的身心特點和知識基礎出發，依據教學大綱的基本要求，制定教學計劃。各學校的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課時安排，均根據藏族學生的實際而定。盡可能地安排了一些選修課和講座，使學生經常瞭解西藏的發展和建設成就，激發他們熱愛西藏、建設西藏的感情；同時，還組織同學們參加社會實踐和勞動，使他們既學到較扎實的文化知識又懂得一定的實用技術。針對學生的實際情況，各學校及時修改調整教學計劃，采取增加輔導課時及重點學生重點輔導的辦法，使藏族學生的成績很快得到提高。

第三、辦好內地西藏教育，必須要有一支熱愛西藏教育的師資隊伍。

教師是人類科學文化的傳播者，他們在辦好內地西藏教育中起著橋梁和紐帶的作用。在內地開辦西藏班（校）的十多年來，各地都選派政治和業務素質好、有奉獻精神且有管理和教育經驗的教師隊伍。其特點是擁有相當大的數量，較高的政治修養，一定的科學文化素質，較多的教學經驗，具有兢兢業業獻身于西藏教育事業的精神。他們懷著深厚的民族感情，以培養藏族人才為己任，嘔心瀝血。他們終年與學生朝夕相處，教學、輔導、管理工作格外辛苦。他們既作師長又作父母，從生活上手把手幫助藏族學生，使他們逐漸養成健康、科學、文明的生活習慣。近年來，涌現出一批熱愛藏族教育事業，樂于奉獻，責任心強，素質高，經驗豐富的教工隊伍。

第四、辦好內地西藏教育，各方面必須通力協作、互相支援。

內地開辦西藏班（校）是一項艱巨而又複雜的政治任務和教育活動。任務的完成不僅涉及到人、財、物、資訊、時間等多種條件，而且涉及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是一件涉及面廣、計劃性和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此項工作不是學校一家能辦好的事，它的影響和需要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政府和各部門通力協作、互相支援是辦好內地西藏教育的重要條件。近二十年來，在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積極協調下，各地各部門

都把援藏辦學視為己任，皆給予支援和配合，形成了內地為西藏辦學的良好社會環境。

（2005 年 8 月 11 日收件，2005 年 11 月 30 日完成審查）

參考書目：

- 1、《當代中國的西藏》，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1991 年。
- 2、《教育論文選集》，西藏自治區教育學會和自治區民族教育研究所編，1989 年。
- 3、《西藏教育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出版，1989 年。
- 4、《西藏的教育》，多杰才旦著，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1991 年。
- 5、《1990---2002 教育統計年鑒》，國家教委計劃司編。
- 6、《1994 年教育統計年鑒》，西藏自治區教委編。
- 7、《當代中國西藏人口》，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1992 年。
- 8、《西藏自治區教育科研論文選編》西藏教育研究所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 年 8 月。
- 9、《西藏教育的特殊性與內地辦學研究》，周旺雲、吳德剛編著，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1996 年 6 月。
- 10、《中國西藏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理論研究》，吳德剛著，雲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11 月。

作者：周潤年、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臺灣政治大學、世新大學、法光研究所客座教授。



## 評介崔著《中國古代和親史》

劉學鈺<sup>1</sup>

中原大學副教授

人類婚姻自始即非奠基於愛情，初民之亂婚姑且不論，進入偶婚之後，其婚姻形式有掠奪婚、交換婚、買賣婚……等十餘種<sup>2</sup>，婚姻始終為兩個家庭、家族、部落，甚至兩個國家間產生關係之主要媒介，在層次較低之家庭、家族間之婚姻，可稱之為兩姓聯姻，在層次較高之部落或部族、國家間之婚姻，則稱之為「和親」。提及「和親」絕大多數人第一反應即為西漢高祖劉邦，被匈奴冒頓單于（冒頓，讀苦墨毒）圍於白登（今山西大同附近）時，採劉敬之計以漢翁主（實際均以宮中良家子為公主）嫁匈奴單于，以換得匈奴冒頓單于解圍，由是遂以此為和親之始，宋司馬光於所編《資治通鑑》卷十二〈（漢）高帝九年冬〉條即稱：「蓋世上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司馬光之說誤導後人以為和親始於漢初。但吾人如詳讀史傳，當知「和親」一詞早在先秦時代即已出現，如《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即出現「和親」一詞，惟其意僅指和睦相處，並未涉聯姻，但在上古之時，不同氏族或民族間之聯姻，固所在多有，如《史記·五帝本記·殷本記》等史傳均載有其事，可說俯拾即是，不必一一列舉，因此「和親」一詞與和親之事實，均早於西漢，此乃不爭之史實。

<sup>1</sup> 作者現為中原大學、輔仁大學兼任教授，中國邊政協會秘書長、《中國季政》季刊主編，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兼主任秘書，著有《匈奴史論》、《鮮卑史論》、《北亞游牧民族雙軌政制》、《五胡史論》、《外蒙古問題》（以上五書均由台北南天書局分別於1983、1994、1999、2001、2001年出版）、《清季民初中蒙關係》（蒙藏委員會2002年）、《胡馬渡陰山》、《五胡興華》（兩書均為知書房，2004）等專書十餘種，另論文數十篇。

<sup>2</sup> 關於人類婚姻形式及演變，可參看蘇冰、魏林《中國婚姻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3），另劉學鈺《中國文化史講稿》（台北知書房，2005年，頁29~51）。

不過國史上自周初行分封眾建之後，有所謂周天子與受封眾諸侯國，類若後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係，彼此之聯姻，固所在多有，但與後世之所謂「和親」，在認知上確有所不同，惟自周平王東遷後，眾諸侯國坐大，強者若齊桓、晉文之屬，其聲勢且駕凌周天子之上，至是無論周王室與眾諸侯之聯姻，或各諸侯國間之聯姻，則與後世所認知之「和親」已然完全一致。秦一天下，廢封建設郡縣、漢承秦祚，已無諸侯國，以是漢高祖時與匈奴之「和親」遂成爲中國中央政府與「外國」以婚姻建構雙方和平關係之首創者，自西漢以至清代，「和親」遂成爲中國與周邊非漢人政權，或中國與非漢人藩屬領袖維繫關係之一種手段<sup>3</sup>如從「和親」之功能性看，則可分爲安邊型、結交軍事同盟型、分化瓦解少數民族政權型、借兵及酬恩報德型、發展關係型、鞏固盟好型、政治聯盟型等七種<sup>4</sup>，可見「和親」一事在國史上占有相當份量。惟以往學界對歷代和親從未有專門著述，雖對其中若干特例如王昭君、細君、解憂、文成、金城等公主之和親，有所著墨，往往偏重於被和親公主之感性面描述，對於其在政治、歷史意義上，鮮少提及，況且僅此數例，也難窺和親之全貌，缺乏一部和親史專著，誠爲民族關係史，古代政治史乃至國史之一大缺憾。

今者，有山東煙台大學崔明德教授就國史有關和親之史事，經過耙梳整理著成專書，題之曰《中國古代和親史》，以補學界之不足，經詳讀該書，不揣簡介評如次，願學界對史上和親之重視。作者崔明德，1959 年生於山東省萊西市，先後獲有碩士，博士學位，現爲山東煙台大學教授兼副校長，著有《先秦政治婚姻史》等多部專書，而《中國古代和親史》乃集其大成者，此書七百六十五頁近五十萬言，可稱煌煌巨著，由人民出版社於 2005 年 7 月出版，全書除緒論外，共分二十一章，另有〈先秦政治婚姻簡表〉等五個附錄，綜讀此書有以下幾項特色，頗值向學界推薦：

<sup>3</sup> 關於「和親」之類型，崔明德《中國古代和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 7 月，提出有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之間的聯姻、割據政權與少數民族之間的聯姻，割據政權之間的聯姻、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聯姻、南朝與北朝之間的聯姻，從現今看來屬於外國之間的聯姻等六種，詳見該書頁 5~8。

<sup>4</sup> 注 3 所引書頁 8~17。

## 一、彌補國史上空白

中國歷史悠久，史料完備除歷朝正史外，另有編年之《資治通鑑》以及各式各類政書，此為舉世任何國家、民族所無法比擬者，惟在此眾多史著中，尚無較完整之歷代各民族通婚、作系統性敘述之專書，形同在國史上留下一段空白不為無憾，崔著《中國古代和親史》正可彌補此項空白。

## 二、雙向論述立場周延

歷來對和親一事，每多集中於富感性之少數和親「公主」（事實上以中原王朝皇帝親生女下嫁者並不多），如王昭君、文成公主等，唐代文人詠昭君「和番」之詩多達數十首、詠文成、金城公主者也多達十餘首<sup>5</sup>。而歷代文獻也多敘述中原王朝公主和親之事，對四周少數民族政權或藩屬「公主」嫁中原王朝者，則鮮少提及，此種單向之記載，往往易使後人誤以為和親僅為中原王朝公主下嫁四周少數民族政權首領之專稱，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崔著《中國古代和親史》對四週少數民族政權以「公主」（按四周少數民族似不用公主二字，茲為方便讀者瞭解，姑以已約定成俗之公主稱之）嫁中原王朝者，也有所著墨，可見該書第十二章對此即有所敘述（見該書第 324~325 頁），此種雙向描述，為向所未有者。

## 三、擴大範圍涉及面廣

崔著《中國古代和親史》第十八、十九兩章（頁 514~568），特別就和親與絲綢之路之拓展及和親與西域文明之提升有所論述，按西域有廣狹二義，狹義之西域僅指今天山南北而言，廣義之西域則兼含今之中央亞細亞<sup>6</sup>，此一部分向為他書所未曾涉及者，崔著在書中就和親對西域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之影響，作深入之論述，可以擴大吾人視野，也為研究西域史者開拓新領域，彌足稱道。

<sup>5</sup> 全唐詩中詠王昭君者多達 66 首，詳情見馮藝超《唐詩中和親主題研究》台北天山出版社，1994 年出版。

<sup>6</sup> 余太山主編《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1。

#### 四、資料完備考證翔實

歷代正史，各類政書《資治通鑑》乃至各代史家、文人之著述，雖也多有提及和親之事，但多屬零星或者夾雜於其他資料之中，蒐集至為不易，整理更為困難，而崔明德先生不憚繁瑣就古往今來所有文獻中，凡與和親有關之文獻若正史、類書、會要、起居注、文集、詩集、方志、變文乃至考古資料，均加以收集，此一工作雖極繁瑣，但凡有耐心毅力，均可完成，難在收集後之爬梳整理，而排比考證尤難。但崔明德先生以其嚴格之科學訓條，從諸多不同之史料中加以考證，終於得出合於史實之結論，如歷來對出嫁契丹之靜樂公主及嫁奚之固安公主與宜芳公主之身世問題，向有不同之說法，經崔氏不避艱難詳加考證，終於釐得真象，靜樂公主為唐玄宗李隆基之外孫女，固安公主為唐玄宗之從外甥女，宜芳公主則為唐玄宗第十三女衛國公主與楊說所生之女。復如唐僕固懷恩究有幾個女兒嫁回紇？學界歷來未得定論，或云一個，或稱二個，經崔氏細緻之考證，得知僕固懷恩共有三個女兒嫁回紇。類此足見崔氏用心之深，功力之厚。

#### 五、推陳出新建立理論

向者學界並非全無論及和親者，但多偏於某位公主、或某一時代，就整個和親問題而言，不無偏狹之嫌，且僅對和親之過程加以敘述，並未涉及和親之理論，崔著《中國古代和親史》，則作推陳出新對和親作全面性之論述，不僅如此，更建立和親之理論架構，如該書第二十章〈中國古代和親文化的形成、功能及影響〉（頁 568~600），企圖從歷代和親文化中，歸納出和親文化之理論架構，洵屬前所未有者。

總而言之，崔著《中國古代和親史》為一部史料充沛，結構嚴謹、考證翔實，雖取材於舊史料，但卻有新創見之巨著，特評介如上。

## 踏上大興安嶺走進嘎仙洞—鮮卑石室參訪記

劉學鈞

中原大學兼任教授

如同天山、祈連山一樣，都是中國北方著名大山脈，然而大興安嶺山脈卻孕育出中國偉大之東胡系、肅慎系兩大民族，此點則為其他山系所無法比擬的。大興安嶺這個名詞，從讀小學開始就進入了筆者的腦海，後來研究北方各民族史，是在文獻上不停的接觸到這個令人嚮往、而且令人陶醉的名詞，只是早期格於法令，兩岸無法自由來往；近十多年來，又由於公私兩忙分身乏術，很想親炙這片廣袤的呼倫貝爾大草原，跟神秘的大興安嶺，尤其是嘎仙洞，卻無法達到願望，只好暫時擺在心裡，心想祇要時機一旦成熟，一定要實現這個願望。

去（2004）年，筆者自公職退休，專心教學，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吳楚克教授力邀前往內蒙參訪，原已排定行程，不巧，臨行之前遇上颱風，飛機停飛，本來可以等颱風過去再去，可是心想可能是個「諸事不吉」的年份，所以決定取消內蒙之行。

今（2005）年，楚克兄仍然力邀，在盛情難卻而又心嚮往之的情形下，決定八月十日出發，目標定在嘎仙洞。八月十日搭上午十時的航班，在香港轉機，於當天下午六時許抵達北京，楚克兄已在機場等候多時。由於行程很「緊張」，隔天一大早就要搭機往海拉爾，所以當天晚上就住在楚克兄家裡。十一日上午，兩人飛抵呼倫貝爾市（原為呼倫貝爾盟，現已改市）首府海拉爾，內蒙首府呼和浩特市東北亞研究所主任孟利平兄也特地遠道趕來會合。於是，先把行李放在海拉爾市利源賓館，在利平兄的引導下，到一家富有達斡爾民族特色的餐廳用餐，特別點了一道「昆莫勒」（柳蒿芽？）的民族菜餚，顏色雖然烏漆麻黑，嚐起來也帶些苦味，但據說能消暑解毒，便多嚐了幾口，也覺得滿順嘴的。當然，也還有其他菜餚，另外也點了「鮮啤」（也就是生啤酒），也許由於呼倫貝爾草原的

水質特好，這鮮啤喝起來更覺爽口，不知不覺我們三人竟然喝了一整桶。席間請一位達斡爾族姑娘來唱歌，歌聲高亢婉轉，富有草原特色。

下午在海拉爾市區閒逛，買了些當地土產「姑娘」（一種植物，比台灣的小蕃茄小，黃顏色，滿可口）、香瓜等。晚間由呼倫貝爾市孟松林部長宴請，孟先生是鄂倫春族，原本是位經過嚴格科學訓練，以濟世救人為職志的外科醫生，由於他醫術精湛遠近馳名，硬被任命為鄂倫春自治旗旗長，一幹就是十年，應該是政聲卓著，便被提拔到呼倫貝爾市當部長。孟先生為人直爽，從談話中能感受到他心胸開闊，處處為少數民族的福祉著想。這個晚宴酒足飯飽賓主盡歡，之後到海拉爾成吉思汗廣場，這廣場類似公園，規模不小，樹多人也多，還有噴泉，把北國夜景點綴得美輪美奐。看看已經很晚了，就回利源賓館歇息，因為明天要直奔阿里河，有很長的路要走，必得養足精神才好。

八月十二日晨八時四十分，乘越野車向鄂倫春自治旗阿里河市出發，沿大興安嶺邊緣北上，放眼望去，一邊是大興安嶺，一邊是呼倫貝爾大草原，兩邊都是綠油油一片直達天際。越過額爾古納旗，車行四個小時已經近下午一點，只好在根河市打尖，找了一家餐廳，雖然不大卻很乾淨，點的幾樣菜其中有一道是魚子，好大一盤又味道鮮美，我們連駕駛朱先生一共四人，只吃了三分之一，剩下的打包，預備晚上到阿里河市時再吃。

午飯後繼續前進，終於進入鄂倫春自治旗境內，有勞旗裡的涂利利部長，和僑辦主任王嶺麗女士，特地駕車到阿里河市郊外迎接，可是不巧雙方並沒有碰上，於是進入阿里河市區，直奔事先約定的嘎仙賓館，再由楚克兄以手機聯絡涂部長，才知道是在路上錯過了。不久涂部長他們趕回嘎仙賓館，我們連駕駛一行四人接受涂部長以晚宴款待，菜餚極其豐盛。晚飯後雖然已經八點多了，由於所處緯度很高，天色看起來還不太黑。

阿里河市雖然只是相當北邊的小縣（旗）轄市，可是道路寬大而潔淨，這種景象早已超越了我腦海中的既有概念。一宿無語，筆者向來睡眠少起得早，八月十三日大約四點多鐘就醒了，天色也已大亮，就信步到街上走走，沒想到早上寒氣逼人，只溜達了幾分鐘，就趕忙回賓館以免受涼感冒。早餐後開始進行這趟大陸行的重頭戲—參訪嘎仙洞，行前涂部長交代要帶件長袖衣服，並不是因為嘎仙洞冷，而是山區有一種昆蟲叫「瞎

蒙」（音譯），叮起人來可很利害，所幸從台北出發時帶了件夾克，此時正好派上用場。

嘎仙洞距離阿里河市區只有約十公里，在涂部長和王主任帶領下，兩部休旅車一前一後向嘎仙洞出發，不巧遇到修路，所幸涂部長神通廣大，我們得以在距離嘎仙洞只有幾百步的地方才下車步行，與我們同行的還有鄂倫春自治旗博物館田剛館長。

進了嘎仙洞，彷彿走進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歷史，據《魏書》記載，拓跋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平真君三年（西元 443 年），大興安嶺山區的一個小部落

「國家」烏落侯，遣使到北魏京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向北魏進貢，提出大興安嶺山區有大魏祖先石室，拓跋燾一聽，立即派了謁者僕射（謁者是接待外賓的官；僕射也是官名）庫六官（從姓名看顯然是鮮卑族），中書侍郎（官名）李敞等人，隨同烏落侯使者到「鮮卑石室」致祭祖先，並在石室壁上刊刻祝文。這件事《魏書》曾詳作記載，且把祝文全文記錄下來，後來北魏遷都洛陽，孝文帝死後不久，北魏分裂為東、西魏，再蛻變為北齊、北周，鮮卑石室漸漸被人們遺忘了。

由於鮮卑民族有個習慣，每遷徙到一處，總喜歡把周遭的某座山命名為鮮卑山，所以在文獻上就有了幾個鮮卑山。其實這種情形也是人之常情，就像英國有個地名叫約克（York），後來許多英國人移民到北美洲，為了懷舊就將移居的地方取名紐約（New York）。因為年代久遠又多次改朝換代，原來大鮮卑山的鮮卑石室究竟在那裡，竟然無法考證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雖然有許多學者專家，根據史料記載，判斷鮮卑石室應該在大興安嶺中，只是大興安嶺綿亙好幾百公里，正應了所謂的「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於是也有些學者認為《魏書》上的鮮卑石室，只是魏收撰史時信筆拈來，並非確有其事和確有其地，「鮮卑石室」一度成為史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

然而，中國正史畢竟有其可信賴的傳統，經過大陸考古學界先進的努力，以米文平先生為首的一個考古工作團隊，於西元 1980 年 7 月 30 日，終於在呼倫貝爾盟（其時尚未改為「市」級）鄂倫春自治旗阿里河鎮（其時也未改為旗轄市）大興安嶺的嘎仙洞中，發現了北魏時所刊刻的祝文，

這是史學界、考古學界的偉大發現，幾乎可以跟發現北京猿人化石後先媲美。至於發現的經過，米文平先生及大陸學界都有專書、專文詳加說明，此處就不蛇足了，筆者畢竟遠在萬里之外，如果強要多所介紹，就不無續貂之嫌了。

雖然對鮮卑石室的發現不宜多所着墨，但是嘎仙洞石壁刊刻的祝文，跟《魏書》所載的祝文並非完全一致，這其間的落差，倒是可以說些個人的淺見。爲了明瞭起見，將兩項祝文加以排列比較，然後再略說個人的看法：

石室所刊祝文	《魏書》所載祝文
維太平真君四年癸未七月廿五日 天子臣燾使謁者僕射庫六官 中書侍郎李敞傳 用駿足一元大武 柔毛之牲敢昭告于 皇天之神啓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 田 歷載萬年聿來南遷應受多福 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邊慶流后 胤 延及冲人闡揚玄風增構崇堂剋翦凶 醜 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來王 聞舊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懷希仰余光 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時惟多 祜 歸以謝施推以配天子子孫孫 福祿永延荐于 皇皇帝天 皇皇后土以 皇祖先可寒配 皇妣先可敦配 尙饗	天子燾謹遣敞等 用駿足一元大武 敢昭告於皇天之靈 自起闢之初 佑我皇祖 於彼土田 歷載億年聿來南遷 惟祖惟父光宅中原 克翦凶醜拓定四邊 冲人纂業德聲弗彰 豈謂幽遐 稽首來王 具知舊廟弗毀弗王 悠悠之懷希仰餘光 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時惟多 祜 敢以丕功配饗于天 子子孫孫 福祿永延

比對這兩篇祝文，基本上沒有多大出入，但是在用字遣詞上還是有些不同，石室壁上所刊刻的祝文，是拓跋燾時代的文字，如所週知拓跋燾受崔浩的影響很大，從泛靈的薩滿信仰、佛教信仰改宗道教，這點從他以



「太平真君」爲年號可以得知，並且從此開始「整肅」佛教。在中國佛教史上有所謂「三武之禍」，北魏太武帝拓跋燾首開其端，所以石室的祝文有「闡揚玄風」（石室祝文「揚」作「楊」）這句話。太武帝拓跋燾死後，北魏又立刻恢復了佛教，而且越來越興盛，到了孝文帝元宏（拓跋宏）遷都洛陽後，佛教更達到了空前盛況。陽銜之（陽或作楊）的《洛陽伽藍記》對北魏後期洛陽一地佛教寺廟的奢華情況，有極詳細的描繪。

據相關文獻統計，北魏末期（西元 534 年），僅洛陽一地即有寺廟 1,367 所，而整個北魏境內有寺廟三萬所，僧尼人數近二百萬人<sup>1</sup>。其後北魏分裂爲東、西魏，再蛻化爲北齊、北周，東魏、北齊，一仍北魏的崇佛風氣。魏收撰《魏書》時，正籠罩於這一股崇佛的氣氛下，上距太平真君四年已經有一百多年了，這時鮮卑石室的正確位置很可能早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所以《魏書》中的祝文，跟石室壁上的祝文有所不同，石室壁上的「闡揚玄風，增構崇堂」這幾個字就不見了，關於這一點，從歷史背景上一分析，就自然明白了。

再看石室壁上最後幾句是：「……子子孫孫，福祿永延，荐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尙饗。」在《魏書》中除了「子子孫孫，福祿永延」這八個字還保留之外，「荐于皇皇帝天……」這二十五個字不見了，如果要推敲其原因，或許可以這麼說，北魏拓跋燾太平真君時，上距拓跋珪之建立北魏僅五十多年，還沒有完全脫離草原游牧的生活習俗，而且是祭奠拓跋鮮卑的祖先，自然要用祖先們聽得懂、聽習慣的稱謂，所以在石室所刊刻的祝文用了「可寒」、「可敦」的字樣。按「可寒」就是可汗，「可敦」是可汗的妻子。按「可汗」這個稱謂是柔然人所首創的，在之前，北方草原游牧各民族的首領都稱「單于」，單于的妻子則稱「閼氏」（讀音若胭脂）。石室壁上的祝文用可寒、可敦，正凸顯北魏拓跋燾時，還保有濃厚的草原游牧氣息。至於《魏書》的祝文，就刪去了可寒、可敦，這是由於北魏自拓跋燾之後，努力吸收中原傳統文化，到了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更是全面華化，洛陽成爲全中國（含南朝）衣冠禮儀的中心，《洛陽伽藍記》中，直指洛陽是「衣冠士

<sup>1</sup> 劉學鈞《五胡史論》，台北南天書局出版，2001 年，頁 343；另劉學鈞《中國文化史講稿》，台北知書房出版，2005 年，頁 69。

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自然不會再以可汗、可敦來稱呼帝王跟后妃了。

魏收是北齊時人，撰《魏書》時當然也就不需要可汗、可敦這兩個詞稱了。

其三，在石室祝文中提到祭品有「駿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三樣，而《魏書》祝文中只列了「駿足、一元大武」兩樣，少了柔毛之牲。在這先要了解什麼是「駿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駿足，據《辭海》解釋是「良馬」、「駿馬」<sup>2</sup>。用馬作為牲禮，在漢人社會裡，於戰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前應該不會有的，而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中，則是司空見慣的傳統習俗。「一元大武」指的是肥大的牛，據《禮記·曲禮下》指出：「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豕，音始，即俗稱之豬。鬣，音獵，通常指走獸脖子所長的毛。）豚曰腍肥（腍，音突，指肥大之獸），羊曰柔毛，雞曰音……」，從《禮記》這段文字裡，也可以清楚明白漢人在戰國之前，基本上不以馬作牲禮的，至於「一元大武」何以是指肥大的牛呢？據鄭玄注稱：「元，頭也；武，迹也」孔穎達疏則進一步指出：「牛肥則腳大，腳大則迹痕大，故云一元大武也。」「柔毛之牲」指羊，羊毛柔軟，應該很容易理解。

石室祝文的三牲祭品，何以到了《魏書》的祝文中只贖二牲呢？這個問題需要多費些文字才能說得明白，按北方草原各游牧民族的原始信仰都是泛靈（Animism）的薩滿教<sup>3</sup>，無論日、月、星、辰、山、川、湖、泊、飛禽、走獸、乃至花草、樹木，莫不具有神性，既具神性就要加以膜拜，北魏建立之後，雖然逐漸由游牧走向農業，由泛靈信仰慢慢改宗佛教或道教，但是原有的泛靈信仰並未完全根絕，晚到孝文帝延興二年（西元472年），北魏所膜拜的神靈有：「天地五郊、社稷已下及諸神，合一千七十五所。」<sup>4</sup>在孝文帝之前需要膜拜的神靈顯然更多，拜祭時所用的牲

<sup>2</sup> 《辭海》台北將門文物出版，1987年，頁1296。

<sup>3</sup> 所謂宗教，基本上必需具備若干基本要素，如自有之神祇，自有之經典……。而薩滿信仰並不完全具備這些條件，嚴格的說，薩滿只能稱為信仰，還不能稱為宗教。詳情可參見胡耐安《邊疆民族志》蒙藏委員會出版，1970年，頁57。另王友三《中國宗教史》山東齊魯書社出版，1991年，頁3。

<sup>4</sup> 《魏書·禮志一》

禮也必然極為可觀，在經濟上也是一筆沉重的負擔，因此北魏朝廷也對此作出了規定，事在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拓跋燾之子）永興三年（西元 411 年），稱：「神尊者以馬，次以牛，小以羊」，「非郊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無用牲，群悉用酒脯」<sup>5</sup>，這應該就是《魏書》祝文中，有關祭品少了「柔毛之牲」的原因了。

石室跟《魏書》的祝文，其餘部分基本上沒有什麼出入，至多是用字方面略有不同，例如石室祝文開頭有年月日，而《魏書》祝文中省掉了，這可能是《魏書》已經把拓跋燾遣庫六官、李敞等人前去石室致祭一事，斷定在太平真君四年，也可能沒辦法斷定庫六官、李敞一行那一月、那一天完成致祭大典，所以省略了這一部分。按東魏後期洛陽已經非常紊亂，許多官方史料很可能已經被燒了，所以魏收撰《魏書》時，才沒有把正確的日期給寫上。在日期之後，石室的祝文以「天子臣燾」為開頭，而《魏書》則略去「臣」字。另外，石室祝文有謁者僕射庫六官及李敞的官銜，但《魏書》則略去了「謁者僕射庫六官」及李敞的官銜，很像是僅李敞奉命前往致祭，不過像這一類少許的差異，對《魏書》的真實性毫無影響。中國歷代正史的可貴，就在於史料的絕對可靠。

「鮮卑石室」的發現，毫無疑問的將鮮卑史研究推上了另一個高峰，也解決了鮮卑山或大鮮卑山究竟在那裡的疑點<sup>6</sup>，所以大陸學界認為鮮卑石室的發現，是「鮮卑史研究的一座豐碑」，應該是毫不誇張的認定。筆者這次參訪嘎仙洞鮮卑石室，可以說是自研究鮮卑史事以來最踏實的收穫。對於呼倫貝爾市孟松林部長、鄂倫春自治旗涂利利部長、王嶺麗主任、田剛館長以及全程安排並陪同的吳楚克兄、孟利平兄再度表達由衷的感謝。參訪過鮮卑石室後，深覺不虛這次萬里奔波，接下來的參訪行程就覺得輕鬆了。

八月十三日上午，參訪過鮮卑石室後，返回阿里河市，參觀鄂倫春旗

<sup>5</sup> 同 4。

<sup>6</sup> 在鮮卑石室發現之前，對於鮮卑山或大鮮卑山之地望，有諸多不同說法，如《遼史拾遺》卷十三引〈隋圖經〉稱「鮮卑山在柳城縣東南二百里」；《大清一統志》稱「鮮卑山在科爾沁右翼中旗」；《太平御覽·地部十》〈鮮卑山〉條稱「……棘城之東，塞外又有鮮卑山，在遼西之西北一百里。」《讀史方輿紀要》稱「或曰鮮卑山即青山」等，詳見劉學鈞《鮮卑史論》台北南天書局出版，1994 年，頁 44～49。

博物館。照說，阿里河市在整個大陸而言，只是個縣（旗）轄市，市區既不太熱鬧，人口也不太多，但是這個博物館的規模卻相當壯觀，尤其館內文物不但豐富，更具有歷史跟民族特色，就一個縣（旗）級博物館而言，能有這種規模及內涵，相當值得稱讚。參觀時導覽小姐（我知道小姐這個詞稱在大陸並不討喜，如果稱同志，又實在說不出口）對鮮卑民族南遷路線，能夠不加思索娓娓道來，這不止是她本身點慧過人，田剛館長的領導有方也應該是因素之一。

八月十三日下午，在涂部長、王主任陪同下，驅車去參觀前中國最北的軍事基地—布蘇里，由於中蘇之間已經不再劍拔弩張，而且邊界已經劃定了，所以彼此約定在邊境五百公里內，不設任何軍事基地，於是布蘇里軍事基地

轉化成國防教育參觀景點。這個前軍事基地規模極可觀，幾乎全部地下化了，在炎炎的夏日，一進入地下道，頓覺寒氣逼人，必須穿上事先租來的厚重冬季大衣，否則難以抵擋地下洞穴的寒氣。在許多地下洞穴中，有一個稱為「鮮卑洞」的，據導覽小姐稱洞中有圖騰柱及木偶，令筆者心嚮往之，可惜這個鮮卑洞可能還沒整理好，所以沒有開放，不免覺得遺憾。

八月十四日上午，應鄂倫春旗博物館之邀，去參加有關「鮮卑史」的小型座談，由吳楚克兄引言，筆者作鮮卑史的專題報告，之後由參加者提問題，筆者作答，前後大約一個多鐘頭。這次是長途旅行，自然沒有帶什麼參考書，報告時只能憑筆者以往投注在研究鮮卑史上的記憶，談不上精彩，所幸也沒有出錯，報告後與會者也提出了一些很中肯的問題，萬幸也都在筆者的學識範圍之內，所以算是很圓滿。

由於已經確定當天中午十二點多，要到屬於黑龍江省、但卻在鄂倫春旗境內的加達格奇搭火車到北京，只好結束了座談會，驅車東奔加達格奇。由加達格奇到北京的火車，要整整坐二十四小時，這是筆者有生以來所坐過時間最長的火車。八月十五日下午抵達北京，再盤桓兩天返回台北，結束了大興安嶺嘎仙洞之行，旅程雖然結束了，但濃濃的人情味，以及鮮卑石室的情景，卻始終停留在筆者的腦海裡。

## 中國邊政協會第 38 屆 94 年第 2 次常務 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94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台北市金山南路寧福樓

主席：理事長阿不都拉

紀錄：王維芳

出席：

（一）常務理事：

（二）常務監事：

（三）列席：

### 一、秘書處報告：

- (一) 阿理事長目前因臨時住院開刀，本次常務理監事會煩請林常務理事恩顯代為主持。
- (二) 阿理事長情況良好，日內即可出院，特囑各常務理監事放心。

### 二、討論事項

- (一) 林常務理事建議在「中國邊政」刊物之下加「學報」或「季刊」字樣，可否請討論。
- (二) 年會召開日期請討論。

### 三、決議事項

- (一) 全體常務理監事一致祝阿理事長早日康復。
- (二) 感謝季刊榮譽發行人楊總裁鼎力贊助，使季刊得以賡續發行，楊總裁允諾繼續支持。
- (三) 「中國邊政」版權頁已有「季刊」二字，封面似可不必再加此二字。
- (四) 關於年會召開時間請秘書長與理事長洽妥日期，大致以 95 年 2、3 月為宜。

##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鈞。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名譽發行人：楊克誠  
發行人：阿不都拉  
社長：林恩顯  
主編：劉學鈞  
電話：0921-883325  
2218-6116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印刷者：晟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寧波西街 124-2 號 1 樓  
電話：2303-94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